

贺 信

兰州城市学院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

欣闻由甘肃省教育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办的“路易·艾黎精神与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在你校举办,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参加论坛的各位领导、同志、朋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路易·艾黎先生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工合运动重要发起人、培黎学校的主要创建者。他1927年远赴中国,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受到了中国人民由衷的崇敬和爱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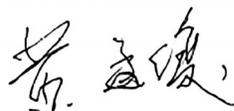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对路易·艾黎先生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要发扬“路易·艾黎精神”,传承培黎学校光荣历史和国际主义精神,心系国家、艰苦奋斗,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

作为艾黎教育事业的继承者,兰州城市学院、路易·艾黎研究中心近年来在挖掘、整理和研究艾黎文化遗产,践行艾老倡导的“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思想和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艾黎精神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本次论坛立意高远,聚焦发展,贴近实际,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树立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际行动,是紧密结合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而对路易·艾黎精神及其教育思想的一次深入探讨,必将进一步增强学校建设城市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信心和决心。

在此次论坛上,将由兰州城市学院、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培黎职业学院(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三所学校共同倡议发起成立培黎国际教育联盟,同时还要举办“东西部高等教育协作与产教融合分论坛”,正当其时、恰逢其势,这是“职教兴国、技能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扬传承艾老“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的生动体现,有利于开展校际合作、国际交流,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也有利于携手打造以发扬“路易·艾黎精神”为核心的培黎文化,做大做强培黎品牌。希望三所学校赓续培黎文化根脉,竭诚合作,坚持守正创新,协同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高等教育实践的崭新篇章。

预祝“路易·艾黎精神与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2023年4月24日

(本文系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兰州城市学院名誉院长、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黄孟复致“路易·艾黎精神与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论坛”贺信全文。)

培黎通讯

2023年第2期(总第41期)

主 办：兰州城市学院
 编 辑：路易·艾黎研究中心
 鸣 谢：培黎老校友
 顾 问：周起秀 刘铁林 聂广涛
 王自刚 李建平 况 鹰
 马宝茹 刘世仲 王延义
 刘铁林 杨作俊

编委会

主 任：许尔忠
 副主任：石 虹
 编 委：冯 驱 刘国忠 张雷涛
 刘晓霞 白晓霞 许立业
 董 沼

编辑部

策 划：石 虹
 编 务：董 沼 曾桐铭 焦晓霞
 宋 福 郭忠宁 聂 炜

赠 阅：培黎校友、艾黎研究人员
 地 址：兰州市安宁区安宁东路
 572号

邮政编码：730070

电子邮箱：519187952@qq.com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网站：

<http://rar.lzcu.edu.cn>

印 刷：甘肃日报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务分公司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准印证号(甘)LK6201019

印数：500册



欢迎关注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官方微信

目 录

卷首语

贺信..... 黄孟复(1)

工作动态

陕西省工业协会成立..... (4)

中国工合运动图片展及艾黎纪念活动

在西安培华学院举行..... (6)

“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在新西兰举办..... (7)

路易·艾黎精神与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

论坛在兰州举办..... (10)

实录一帧

传承弘扬路易·艾黎精神

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张世珍(15)

发扬路易·艾黎精神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梁保平(16)

弘扬路易·艾黎精神

汇聚学校高质量发展合力..... 许尔忠(18)

高山仰止

我与艾黎的第一次会面..... 康世恩(20)

专家特稿

在抗战烽火中历练成长的中国工合..... 唐保玲(21)

深切缅怀

怀念我的义父路易·艾黎..... 邓邦镇(25)

深厚友谊

艾黎与何克：诗歌中的挚友情..... 刘国忠(29)

学术交流

工合运动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独特贡献

——以抗战时期西北工合妇女工作为例..... 董 沼(33)

史料钩沉

关于新西兰友人艾启赫的史料(四)…………… 秦泉安(39)

艾黎足迹

路易·艾黎在金台…………… 张占勤(41)

国际友人

把光荣镌刻在中国的伟大征程里…………… 李 舫(44)

工合之窗

工合运动记述…………… 路易·艾黎(47)

何克专栏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乔治·艾温·何克…………… 任立之(50)

乔治·何克的中国情…………… 双 蝶(53)

培黎纪事

培黎中国工合学校…………… 乔治·何克(秦泉安译)(58)

照片档案

一张珍贵的历史照…………… 况 鹰(63)

文物故事

宝鸡大新面粉厂厂徽背后的工合故事…………… 王跟东(64)

封面题字 俞 宏**封面** 新西兰《听众》周刊1980年5月3-9日号封面**封二 路易·艾黎:伟大的父亲**

无微不至(图1) 父爱如山(图2)

伟岸肩膀(图3) 同甘共苦(图4)

谆谆教诲(图5) 良师益友(图6)

心系山丹(图7) 慈祥爷爷(图8)

天伦之乐(图9) 幸福家庭(图10)

封三 艺术家笔下的路易·艾黎(原载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网站)

油画《路易·艾黎肖像》,作者:韩乐然(图1)

木刻《路易·艾黎》,作者:沈北雁(图2)

油画《路易·艾黎在工作》,作者:邓邦镇(图3)

钢笔画《艾黎像》,作者:陈一鸣(图4)

油画《路易·艾黎》,作者:金国明(图5)

版画《路易·艾黎在山丹》,作者:王自刚(图6)

封底 路易·艾黎精神与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合影

作为全面战略伙伴,我们要加强沟通,增进互信,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确保中新关系可持续、不偏航。要深化在经贸、科技、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实施好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要传承好、发展好“路易·艾黎精神”,支持两国地方、民间、青少年加强对话交流,增进两国民众友谊。中新都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受益者,要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平是中国最执著的追求,中国历史上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谋求霸权。中国对太平洋岛国政策的出发点始终是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中方愿同新方密切协作,共同促进太平洋岛国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习近平会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人民网
2022.11.19

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成立

4月15日,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一届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大会在西安培华学院召开。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中央编办监督检查司原司长田玉萍,陕西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单耀峰出席会议并讲话,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事处副处长张欣胜等到会指导。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专职副会长曹辉,中国工合国际副主席、原新中友协全国主席荣大伟,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常委、工合国际农业专委会主任张蕮霖,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副理事长、西安培华学院理事长姜波,西安培华学院党委书记罗新远,陕西省农促农业厅原总经济师张旭锋,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常务理事、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惠朝阳,原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秘书长张富增等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坐。



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大会

会上,陕西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单耀峰同志宣读了陕西省民政厅准予行政许可决定

书;听取了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筹备组成员、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执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秦泉安同志作关于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筹备工作的报告;审议通过了《章程》《收费办法》《选举办法》等三个文件;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筹备组成员、西安大唐电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锋国主持阶段会议。

大会选举姜波担任协会理事长,丁云波担任监事长,田昊、张锋国、杨柳、秦泉安担任副理事长,秦泉安兼任秘书长,提名柳雨、唐文辉担任副秘书长。

与会领导为新当选的理事长、监事长、副理事长以及秘书长颁发聘书。田玉萍、单耀峰、张欣胜、姜波等同志共同为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揭牌。西安纺织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纪委书记杨柳宣读了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政府原副省长李金柱同志向大会发来的贺信。

除此之外,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河南省工业合作协会、甘肃省工业合作协会筹委会、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等也向陕西工合的成立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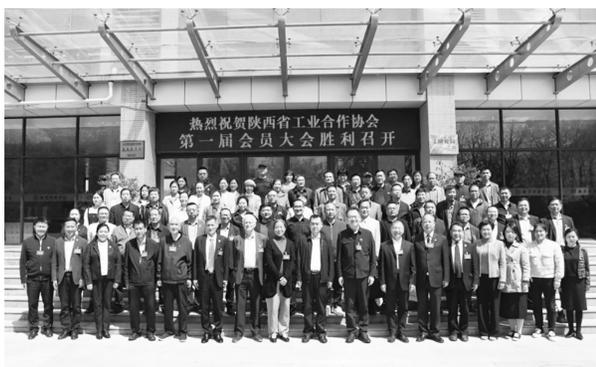
作为新一届协会理事长,姜波在表态发言中详细地回顾了陕西工合的筹备过程,他表示陕西工合的成立是全体陕西工合人的荣光,并向长期支持陕西工合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企事业单位表示感谢。他希望陕西工合要立足

新时代,积极开展各类交流活动,传播工合声音、弘扬工合事迹。他还提出四项表态:第一,以更大拼劲和干劲办好陕西工合;第二,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地方企业和经济发展;第三,发扬工合传统,推进工合事业发展;第四,加强西北工合的研究工作,挖掘更丰富的中国工合历史。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田玉萍在讲话中指出,陕西是中国工合的发祥地之一,三秦大地到处留下了工合人爱国奋斗的足迹,工合在陕西有着深远的影响。希望新成立的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继续传承和发扬“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充分发挥“经济性、统战性、国际性、综合性”的特色和工合文化优势,积极搭建信息化大背景下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的桥梁与平台,积极开创陕西工合工作新局面,赋能服务陕西经济社会的发展。

会后,与会专家、学者一同参观了正在西安培华学院博远楼举办的中国工合运动图片展,通过史料、实物等进一步了解了工合的历史发展,增强了工合人的使命感。据了解,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下,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及爱国民主人士发起,国共两党高层要员参与组建和领导,于1938年8月在武汉成立的。它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是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晶,也是目前大陆唯一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并仍在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接受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和陕西省民政厅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管理,是由陕西省工业企业及与工业相关的

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热心工合事业的人士与组织自愿结成的具有先进性、统战性、经济性的社会团体。协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承工合传统,弘扬工合精神,光大工合事业,坚持政治建会、团结立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从严治会,以工业强省为引领,以合作经济为基础,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合作发展,引地区联合之风范,领工业合作之先导,致力于建设成为全省经济社团组织的领航者。当日下午,中国工合领导与陕西工合协会理事、会员、宝鸡工合(筹)、凤县工合、延安工合(研究者)以及工合国际友人之间围绕工合工作相继召开座谈会。



与会人员合影

陕西省喜剧美学研究会、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陕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甘肃省张掖市山丹艾黎纪念馆、西安工合教育培训中心、宝鸡长乐原管委会、延安红岭文化培训中心的负责同志也参加了成立大会。

(稿件来源自:西安培华学院2023.4.15)

中国工合运动图片展 及艾黎纪念活动在西安培华学院举行

4月15日,由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与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举办的中国工合运动图片展及艾黎纪念活动在西安培华学院举行。来自国内外从事工合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发展。活动由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筹备组成员、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执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秦泉安主持。



中国工合运动图片展及艾黎纪念活动在西安培华学院举行

活动现场,陕西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领导、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田玉萍理事长、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副主席,原新中友协主席荣大伟先生,中国工合副理事长、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姜波先后致辞,表达了对工合历史的景仰以及对艾黎先生的悼念,希望后来的工合人不忘初心,坚守初衷,把工合的事业发扬光大。

期间,路易艾黎长孙段海龙向展览活动发来了贺信,表示将会尽最大努力,为支持中国工

合运动的研究和发展,理所应当做出应有的贡献。并为此次展览展赠送路易艾黎先生生前亲笔签名出版的两本书籍及其他珍贵资料。



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作家给陕西省对外友协捐赠书籍,陕西斯诺研究中心名誉主席马珂先生为陕西工合协会捐赠书籍,中国工合国际常委、农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张蕮霖为陕西工合捐赠书籍。



仪式结束后,与会人员参观了图片展,进一步了解了工合史,激发了干劲。

(稿件来源自:西安培华学院2023.4.16)

“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在新西兰举办

新华社惠灵顿4月21日电(记者卢怀谦李惠子)由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办、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支持的“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21日在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毛利文化中心开幕,将持续至23日。

此次展览展出数十件艾黎生前使用过的实物、百余张珍贵历史图片以及数十件书画艺术作品。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在开幕式上说,96年前的4月21日,艾黎踏上中国土地,开启了一段在时代变革浪潮中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的传奇人生。艾黎是中新友谊的重要奠基者和建设者,也是中新友好的“金字招牌”。王小龙呼吁鼓励青年交流,培育更多新时代的“路易·艾黎”。

新西兰前议长戴维·卡特在致辞中说,此次展览继续发扬促进新中友好的路易·艾黎精神,年轻一代需要了解艾黎的影响。新中友协主席克里斯·利普斯科姆说,新中友协是70多年前由艾黎建议成立的,他是新中关系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艾黎的养子邓邦镇与妻子卢波携多件画作参展。在路易·艾黎精神引领下,邓邦镇夫妇长期致力于中新文化艺术交流。

路易·艾黎(1897-1987)自1927年起在华工作生活60年,是工业合作社运动发起者,山

丹培黎学校创办者,将毕生献给中国解放和建设事业,为中国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完)



王小龙大使出席“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开幕式

4月21日,王小龙大使应邀出席在惠灵顿举行的“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开幕式并致辞。新西兰前议长戴维·卡特爵士、新中关系促进委员会主席麦康年、新中友协主席黎开盛等新各界人士、艾黎亲属、华人华侨近百人参加。

王大使表示,作为一位国际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和中新友谊的开拓者,艾黎帮助中新两国人民建立了跨越山海的友谊,他的事迹和所代表的精神感动并激励着一代代中新两国人民为中新友好事业奋斗。在开启两国关系第二个50年新征程之际,中新两国各界人士应继承艾黎遗志,弘扬“友好、包容、奋进”的艾黎

精神,推动两国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的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并为世界和地区和平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发扬路易·艾黎精神,传承中新友好事业 ——在“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开幕式上的讲话

王小龙

尊敬的卡特爵士,
麦康年大使,
弗恩副市长,
黎开盛主席,
邓邦镇先生和卢波女士,
路易·艾黎亲属,
黄玮璋会长,
乔治兵会长,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出席“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开幕式。首先,我要特别感谢新中友好协会、新西兰和平之友联谊会、新西兰华人社团联合会、新中商会、新西兰湖南总商会为本次展览成功举办付出的努力。

96年前的今天,1927年4月21日,路易·艾黎首次踏上中国大地,开启了一段走过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的传奇人生;96年后的今天,我们相聚于此,通过展

出的实物与照片,追忆艾黎为中国革命与建设和深化中新友好作出的卓越贡献,共同缅怀他为世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艾黎这位老朋友,新西兰也同样珍视艾黎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发挥的重要作用。上个月,马胡塔外长访华期间专程走访路易·艾黎故居,并出席了艾黎雕像揭幕仪式。艾黎的事迹和所代表的精神感动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和新西兰人为中新友好事业而努力。如今,他的精神对我们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深化中新友好合作仍有重要意义。我愿在此与大家分享艾黎精神中我认为最具启迪的三个方面。

第一,友好。中新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源远流长,艾黎的一生就是这份友谊的最佳写照。他对中国人民有着超越国界的大爱,他在中国生活早期,积极在各地参与救灾赈灾,努力改善劳苦大众的境遇。新中国成立后,他致力于深化中新友好,通过写作、演讲增进新西兰人对新中国的了解与认识,并倡议成立新中友好协会。艾黎的不懈努力为促进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作出了独特贡献,中国老百姓也因此始终对新西兰抱有特别的好感,这种相互理解和友好情谊是我们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核心所在。

第二,包容。新西兰崇尚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处,是多元文化建设的引领者。艾黎作为杰出的新西兰之子,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理念,积极促进不同国情、文化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他摆脱了当时在西方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偏见,用独立、客观、理性的视角去认识中国这一与其过往认知完全不同的文明与国度。他积极融入中国底层百姓,在努力掌握汉语的同时还尝试学习上海、甘肃等地的方言、土话。他欣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了许多古典诗词的英文译作。这样

一种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交流互鉴对今天的世界显得尤为重要,是促进人类进步、超越隔阂冲突、携手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的一个重要动力。

第三,奋进。艾黎是个实干家,他在中国出版的第一本书叫作《有办法》,意为面对困难总会找到解决办法。艾黎本人就是契而不舍、从不言弃的杰出典范。他创办培黎工艺学校,带领鼓励学生们手脑并用、创造分析,克服当地较为落后的生活条件,从无到有建起了一座自给自足、颇具规模、造福周边百姓的职业技能学校。艾黎发起的“工合”运动的口号是“努力干,一起干”,而这恰恰也是中新关系历经50年风雨始终走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前列的秘诀之一。我们双方以务实的态度,依靠各自和共同的努力,携手克服双方差异和双边关系中的难点,开展一系列合作,推动两国

关系不断开拓进取。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作为一位国际主义战士、人道主义者,路易·艾黎是中新两国和两国人民跨越山海友谊的开拓者,是我们两国不可多得共同宝贵财富。中新双方都应该珍惜艾黎带给我们的启示,发扬“路易·艾黎精神”,将友好、包容、奋进的理念传递给两国民众特别是两国青年,推动中新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在两国建交的第二个50年更上层楼,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最后,祝愿本次“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圆满成功,祝愿中新友好万古长青!

谢谢大家!

(稿件来源自新华社2023.4.21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 2023.4.22)

■ 培黎讯息

《培黎通讯》获评优秀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5月25日,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举办的“2023年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审读与编辑业务研修班”开展了2023年优秀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评选活动并举行了颁证仪式,由我校主办、路易·艾黎研究中心负责编辑的《培黎通讯》2023年第1期被评为优秀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本次研修班共提交了100余份内部资料性出版物。10多位专家严格对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进行了认真审读和评议,最终评选出30余份优秀资料颁发证书予以表彰奖励。《培黎通讯》以规范的标识、良好的编印质量和彰显国际主义精神和红色基因特色名列其中。

《培黎通讯》由培黎校友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2016年起交由兰州城市学院主办,并申报获批为省级连续性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多年来,资料以“弘扬艾黎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为主线,以讲好“艾黎与中国共产党、艾黎与新中国、艾黎与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为主要内容,开辟有工作动态、国际友人、专家特稿、学术交流、史料钩沉、何克专栏、培黎纪事、工合之窗等栏目,主要登载研究路易·艾黎精神及艾黎、何克生平事迹、工合运动及培黎学校历史等方面的资料 and 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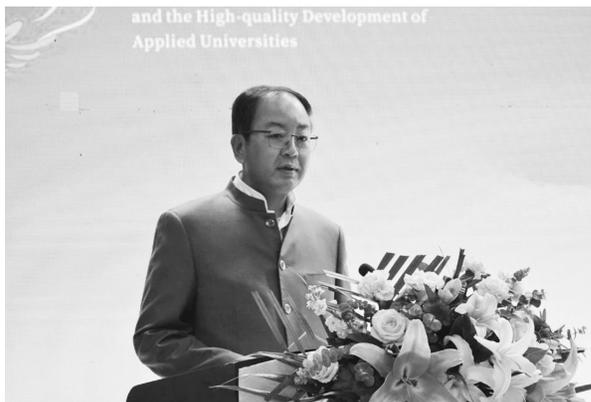
近年来,《培黎通讯》在专家、培黎校友及社会各界人士的鼓励支持下,资料的丰富性、规范性和专业性不断增强,编印质量不断提升,成为缅怀路易·艾黎伟大人、发扬“努力干、一起干”工合精神、传承培黎学校光荣历史、秉承“手脑并用、创造分析”校训的平台,也成为培黎校友和国内外热爱艾黎事业人士的沟通桥梁和纽带。

路易·艾黎精神与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兰州城市学院隆重召开

4月24日,路易·艾黎精神与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兰州城市学院隆重召开。论坛由甘肃省教育厅、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兰州城市学院承办,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推动高校进一步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对于继承艾黎先生教育理念,凝聚国内外各界人士智慧,助推应用型高校建设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兰州城市学院名誉院长黄孟复发来贺信。贺信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路易·艾黎先生给予高度评价,指出要发扬“路易·艾黎精神”,传承培黎学校光荣历史和国际主义精神,心系国家、艰苦奋斗,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论坛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树立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际行动,是紧密结合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而对路易·艾黎精神及其教育思想的一次深入探讨,必将进一步增强兰州城市学院建设城市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信心和决心。论坛上,兰州城市学院等三所学校共同倡议发起成立培黎国际教育联盟,正当其时、恰逢其势,是“职教兴国、技能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发扬传承艾老“努力干、一起干”工合精神的生动体现,希望三所学校赓续培黎文化根脉,竭诚合作,坚持守正创新,协同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高等教育实践的崭新篇章。



甘肃省原副省长,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甘肃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张世珍指出,艾黎先生在甘肃度过辉煌的10年,把全部心血和精力奉献给了甘肃的教育事业,并为甘肃省对外开放打开了重要窗口,是甘肃省推进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名片。希望甘肃省各高等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紧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紧密对接产业结构调整,全面提升办学实力;利用好路易·艾黎的国际影响力,积极扩大对外合作交流,进一步密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交往交流,切实提高国际化水平;传承弘扬路易·艾黎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教育师生树立高尚品德、锤炼优良作风,无私奉献、执着追求,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甘肃省委教育工委委员、专职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张晓东主持开幕式时指出,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甘肃省积极落实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加快推动教育优先发展,构建富有甘肃特色的现代化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打造“一个先行区”,创建“两个示范区”,推进“五大行动”,实施“十大工程”,为应用型高校进一步优化发展路径,提高发展效能提供了有利契机。希望各位领导和专家,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扬路易·艾黎精神和“工合”精神,紧密结合各自的工作实践,从优化人才培养理念、对接人才培养需求、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路径等不同角度,深入阐发对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思考、新探索,为我们进一步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推进开放合作办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重要的参照。



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成员、甘肃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专职副会长梁保平指出,艾黎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思想价值,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增强甘肃省在海内外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助推甘肃文化大省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名片。衷心祝愿论坛取得丰硕成果,将路易·艾黎精神发扬光大,推动我省进一步加强应用型大学建设,打造鲜明特色,拓展开放合作办学,更好地适应

和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努力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兰州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许尔忠致欢迎辞,对出席论坛的领导、嘉宾、专家表示诚挚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校发展的各界友人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应用型大学,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改革所向,更是兰州城市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应有之志、应尽之责、应立之功。学校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建设城市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为目标,持续完善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体系和运转高效的内部治理体系,全力以赴推进硕士点建设、新校区建设和大学更名目标任务,打造区域应用型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城市规划与建设咨询智库、工程技术研发与应用中心、地方文化传承与创新平台,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服务地方能力、文化传承和创新实力、社会影响力五个方面提升,形成差异化竞争力和鲜明的大学辨识度,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迈上快车道,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学校将与国内外热爱艾黎精神人士、研究人员及培黎校友一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路易·艾黎精神,以更加广阔的胸襟和视野,昂扬向上、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全力推进城市

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为甘肃高等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奋勇争先、加速“进位”贡献力量。



兰州城市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曹洁主持论坛主旨报告时指出,兰州城市学院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山丹培黎学校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大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各位专家提出的新思路、新办法,紧密对接国家人才战略需求,结合我省高等教育实际,深入研究进一步优化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新方案、新举措,将发扬艾黎精神、熔铸培黎品牌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进一步践行路易·艾黎倡导的“手脑并用、创造分析”校训精神,拓展“培黎”国际影响力,加强开放合作办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专业链有效对接社会产业链,努力增强人才培养的市场对接能力和社会适应性,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论坛发起成立培黎国际教育联盟倡议,兰州城市学院校长曹洁、北京培黎职业学院院长余临、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副校长温永明代表三所学校在《倡议书》上签字。



论坛中,兰州城市学院校长曹洁与大湾区产教联盟执行会长陈标新代表双方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标新向兰州城市学院颁授“大湾区产教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和“大湾区产教联盟西北区域中心”牌匾。



主旨报告环节中,兰州城市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牟录贵,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理事长田玉萍,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主席、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顾问柯马凯,新中友协原主席、工合国际副主席、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顾问、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荣大伟,合作社专家、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住朝鲜办公室干事、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顾问查添木,兰州大学教授王学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向东,申新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冯驱等专家学者,分别围绕“手脑并用、创造分析”教育理念对新时代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启示,“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和路易·艾黎精神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主旨发言。



与会嘉宾还参观了培黎展览馆,观看了“发扬艾黎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文艺宣讲会。

新中友好协会、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合国际委员会、甘肃省教育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甘肃省对外友好协会、大湾区产教联盟、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甘肃培黎职业学院的领导和专家,兰州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山丹艾黎纪念馆、宝鸡长乐塬抗战工业遗址管委会的特邀学者,以及培黎老校友,兰州城市学院在家校

领导、正处级干部和师生代表参加论坛。论坛通过中国甘肃网直播,有260余万人(次)在线观看了论坛盛况。



撰稿:宋福 审核:宋子琨

■培黎讯息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致“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贺信

新中友好协会:

2023年4月21日,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来华96周年,在这样一个值得缅怀、纪念的日子,欣悉由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支持、由新中友好协会主办的“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开展,值此主题展览隆重开幕之际,谨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本次展览成功面世付出辛勤汗水的策展人邓邦镇先生、卢波女士及各位中新友好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96年前,路易·艾黎先生带着新西兰人民的美好情谊踏上了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从此,他的心紧紧和中国人民贴在一起。他像亲人那样为劳苦大众奔走,扶弱济困;他像战士那样英勇奋斗,支持红色革命;他发起、推动工合运动,筑起抗战的经济防线;他像导师那样循循善诱,把闪光的教育思想融入到为新中国黎明培养人才的创造性教育探索实践中;他像父亲那样慈爱温暖,无数的孤儿、难童得到惠泽养育;他像和平鸽那样在新中国的蓝天上翱翔,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他一生节俭,几无积蓄,却把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和图书捐献出来,逝世后连同骨灰都播撒在他曾经奋斗过的甘肃山丹土地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评价中新友好,指

出,中国和新西兰互为重要合作伙伴,中新建交50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创造了诸多“第一”。还特别强调:“要传承好、发展好‘路易·艾黎精神’,支持两国地方、民间、青少年加强对话交流,增进两国民众友谊。”

路易·艾黎先生正是中新友谊的伟大“架桥者”,他倡导成立于1952年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70余年来,为推动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次展览展出了百余件珍贵历史图片,数十件关于路易·艾黎的书画艺术作品,以及数十件路易·艾黎生前使用过的实物,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是近年来新西兰境内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路易·艾黎主题展览。

相信通过本次展览,广大华人华侨和新西兰各界朋友会进一步深切感受路易·艾黎崇高的品德、高尚的人格和大爱情怀,进一步深入体会“路易·艾黎精神”,进一步深刻感悟中新友谊的弥足珍贵,携手共架友谊桥,同心共筑和平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预祝“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取得圆满成功!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

2023年4月21日

传承弘扬路易·艾黎精神 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张世珍

在这春风和煦、生机勃勃的美好时节,我们相聚在美丽的黄河之滨,隆重举办路易·艾黎精神与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论坛,弘扬路易·艾黎精神(热爱和平、追求正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实践精神;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博爱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研讨推动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在此,我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位领导、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大会的各界朋友表示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先生,于1927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华60年间,为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战争和新中国经济建设,以及中新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访问新西兰时,高度称赞路易·艾黎“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作为现代中国职业教育的最早开拓者之一,艾黎先生注重培养学生的分析判断能力和创造创新能力,倡导“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为新中国建立初期探索改变教育模式、培训培养实用技术人才提供了宝贵经验。他在甘肃度过辉煌的10年,把全部心血和精力奉献给了甘肃的教育事业,并为甘肃省对外开放打开了重要窗口,是甘肃省推进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名片。

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等学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正确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紧跟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紧密对接产业结构调整,从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增强人才应用能力与就业创业入手,全面提升办学实力。利用好路易·艾黎的国际影响力,积极扩大对外合作交流,进一步密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机构的交往交流,开展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有成效的合作办学,切实提高国际化水平。传承弘扬路易·艾黎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教育师生树立高尚品德、锤炼优良作风,无私奉献、执着追求,全力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文是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甘肃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张世珍在路易·艾黎精神与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的讲话摘要,题目为编者所加)

发扬路易·艾黎精神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梁保平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工合运动的重要发起人、培黎学校的创始人，也是甘肃省荣誉公民，是甘肃省与新西兰，特别是与克赖斯特彻奇市友好合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路易·艾黎的一生，是对人类进步事业坚持奋斗的一生，是对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也是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探索实践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的桥梁，为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和国家建设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2019年8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路易·艾黎先生创办的山丹培黎学校实地考察，对路易·艾黎先生给予中国的无私援助、为深化中新两国人民友谊作出的重要贡献进行了高度评价。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泰国曼谷会见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时指出：“要传承好、发展好‘路易·艾黎精神’，支持两国地方、民间、青少年加强对话交流，增进两国民众友谊。”继承和发扬路易·艾黎精神，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甘肃省历来十分重视发扬路易·艾黎精神。1982年以来，先后建立了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艾黎博物馆、山丹艾黎纪

念馆，在兰州城市学院建立了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和培黎展览馆，在深切缅怀和纪念艾黎先生的同时，充分展现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大爱无疆、无私奉献的人道主义精神、“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思想，成为讲好艾黎故事、发扬革命传统、厚植爱国情感、培育民族精神、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阵地和生动课堂。

艾黎先生架起了一座中新友谊和中外合作交流的桥梁。在艾黎先生和新中友协前主席云达忠教授的倡导推动下，1984年，甘肃省与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建立了友好省市关系，2009年，山丹县又与塞尔温区建立了友好县区关系，双方友城交往密切，交流成果丰硕，成为中新地方友好交流合作的典范。近40年来，两省市在农业、畜牧业、教育、文化、科技、体育、人员培训等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交流合作，艾黎精神始终贯穿于友城交往交流中。兰州城市学院的前身之一是艾黎先生创建的培黎石油学校，艾黎先生“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教育理念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我们在接待友城代表团时，必然会安排参观兰州城市学院培黎校区及培黎展览馆和山丹县；组派友城代表团访问克市时，必然会前往艾黎先生出生地斯普林菲尔德等。自两省市结好以

来,克市一直是甘肃省领导出访最多的友城,双方高层互访达34批次,工作访问和市民考察达30批次。2017年,甘肃省在山丹和兰州分别举办纪念艾黎诞辰120周年活动,甘肃省领导还率团专程赴新西兰南岛参加有关纪念活动。2019年,时任甘肃省委书记林铎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新西兰期间,专程到访克市和塞尔温区,出席两省市结好35周年纪念活动,并访问了艾黎家乡的社区、学校和企业,就扩大合作、增进友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

甘肃和克市都非常注重培养两国青年继承艾黎精神和中新友好事业。过去20年,甘肃省外事办选派10名英语翻译赴克市进行为期半年的翻译培训。兰州城市学院和山丹培黎学校派出50多名青年教师和学生赴克市学习交流。克市中国友好委员会和塞尔温区友城委员会累计选派27名新西兰青年参加甘肃省国际交流员研习班。此外,新中友协和克市中国友好委员会还曾长期为我省有关院校选送英语外教。2018年初,我会组织兰州城市学院音乐和体育学院师生参加克市元宵节,表演了敦煌乐舞和武术。2019年初,组织

陇南师专音乐学院的白马藏族学生参加克市元宵节,表演原生态的白马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目,受到克市群众的热烈欢迎。演出间隙,克市方面安排学生们参观艾黎出生地、艾黎公园和学校。对于学生们来说,这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访问新西兰和艾黎的故乡,加深了他们对中新友好和艾黎精神的认识。

艾黎先生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思想价值,已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增强甘肃省在海内外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助推甘肃文化大省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名片。衷心祝愿本次论坛取得丰硕成果,将路易·艾黎精神发扬光大,推动我省进一步加强应用型大学建设,打造鲜明特色,拓展开放合作办学,更好地适应和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努力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大家!

(本文是甘肃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党组成员、甘肃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专职副会长梁保平在“路易·艾黎精神与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的致辞摘要,题目为编者所加)

■培黎讯息

新西兰友人邱明春一行来校参观访问

4月29日,新西兰友人、新中友好协会克赖斯特彻奇市分会副主席邱明春,省外办党组成员、省友协专职副会长梁保平与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行五人来学校参访交流,参观培黎展览馆。校党委副书记、校长曹洁,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李慕堂接待参访团。双方进行交流座谈,就教育领域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及打造路易·艾黎品牌等方面深入交换意见。座谈会上,曹洁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学校

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学校与新西兰长期以来的合作交流互访以及路易·艾黎精神传承等方面的情况,希望双方能够在中新政府项目合作、青年教师的博士与博士后培养、科学研究、师生交流互访、课程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同时进一步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共同努力将路易·艾黎品牌文化延续下去;期望双方在新一轮国际合作交流中深化合作,寻求突破,取得新的成绩、新的收获。

弘扬路易·艾黎精神 汇聚学校高质量发展合力

许尔忠

路易·艾黎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工合运动的重要发起人，培黎学校的主要创建者，宣传新中国的杰出作家，世界和平事业的积极推动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文化遗产。艾黎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同频共振，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用不朽的光辉历史书写了热爱和平、追求正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手脑并用、创造分析”教育实践精神，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博爱精神。这些精神承载着“为中国黎明而培训”崇高使命、蕴含着培黎学校光荣办学历史，闪耀着匠艺强国培黎文化之光，是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推进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宝贵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高水平合作交流，拓展国际合作办学，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我们责无旁贷、使命光荣。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应用型大学，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改革所

向，更是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应有之志、应尽之责、应立之功。本次论坛围绕“路易·艾黎精神与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深入研讨，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抢抓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机遇，汇聚教育科技人才强大合力，拓展合作交流赋能效应，持续推动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长期以来，学校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视察山丹培黎学校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艾黎先生倡导的“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为校训，将“路易·艾黎精神”作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载体，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和校园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作为拓展国际合作交流的靓丽名片，高举培黎文化大旗，熔铸培黎鲜亮品牌。通过办好艾黎研究中心，发挥培黎展览馆、《培黎通讯》、培黎大讲堂作用，打造《艾黎精神与培黎文化》校本思政金课，实施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工程，深度挖掘培黎文化内涵，广泛传播培黎文化。依托“甘肃省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建设，开展职业教育红色文化研学旅行活动，激活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的文化动能和精神力量。

兰州城市学院将以本次论坛为契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意见精神,对标中西部高等教育改革开放先行区建设,紧密结合甘肃省教育厅“五大行动”“十大工程”,以建设城市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为目标,坚持提升内涵,坚持彰显特色,坚持数智赋能,坚持服务地方,持续完善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体系和运转高效的内部治理体系,全力以赴推进硕士点建设、新校区建设和大学更名目标任务,打造区域应用型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城市规划与建设咨询智库、工程技术研发与应用中心、地方文化传承与创新平台,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服务地方能力、文化传承和创新实力、社会影响力五个方面提升,形成差异化竞争力和鲜明的大学辨识度,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迈上快车道,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扬帆新时

代,逐梦新征程。衷心期待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本次论坛主题,进一步发扬艾黎精神,就构建面向现代化的学科专业体系,优化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完善政产学研用机制,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激发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等方面充分交流新思路、新举措,为凝聚发展共识,共创美好未来,集思广益,分享智慧。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我们将与国内外热爱艾黎精神人士、研究人员及培黎校友一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路易·艾黎精神,以更加广阔的胸襟和视野,昂扬向上、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全力推进城市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建设,为甘肃高等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奋勇争先、加速“进位”贡献力量。

(本文是兰州城市学院党委书记许尔忠在路易·艾黎精神与应用型大学高质量发展论坛上的致辞摘要,题目为编者所加)

■培黎讯息

甘肃省审计厅与我校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5月24日下午,甘肃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炎人一行来我校开展“弘扬艾黎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日活动,参观培黎展览馆。活动由甘肃省审计厅财政审计处、重大政策执行处党支部,学校财务处、审计处党支部联合举行,活动以座谈交流、现场参观、专题党课等形式开展。座谈会上,许尔忠对陈炎人一行表示诚挚欢迎,对甘肃

省审计厅一直以来对学校的支持表示感谢,介绍了学校的历史沿革、办学特色及学校发展规划并指出,主题党日活动搭建了政校合作的平台,学校将加强与省审计厅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学校相关业务工作水平,不断提高内部治理水平,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校党委副书记、校长曹洁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我与艾黎的第一次会面

康世恩

提起培黎石油学校,人们总是要联想到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艾黎,回想起他在1942年那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同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一起,为支援反法西斯斗争,在中国偏僻的西北创办培黎工艺学校的感人情景。

记得我第一次到培黎工艺学校同艾黎见面是1949年。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兰州。在向大西北进军的途中,彭德怀司令员接到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命令西北野战军要保护好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创办的甘肃山丹培黎工艺学校。那时,我所在的西北野战军第九师是先头部队。彭德怀司令员就将周恩来副主席的命令交给九师执行。于是,我带了一支队伍急行赶到山丹县,很快找到了培黎工艺学校和艾黎校长。我当面向路易·艾黎校长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命令,并告诉他,我们是奉命来保护培黎学校的。当时艾黎校长百感交集,感动得无法形容。我看到学校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室内的桌、椅是用土台子代替的。但是他们很乐观,还把土台子雕凿成沙发的形状,上面铺上毛毡,成了别具风格的“土沙发”。为了保护学校,我们专门起草了布告,贴在学校大门上,要求后续部队给予保护,并留下一个排为学校站岗。随后,大部队到达山丹县,许多缴获的车辆,有的急需修

理,有的急需人去驾驶。艾黎校长组织的师生员工大显身手,坏的车辆全部包下来修理,没人开的车,学生上去就开起来了,帮助把部队一直送到酒泉。培黎学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学校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以后,培黎工艺学校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所技工学校。近50年来,为石油化工和其它工业战线培养输送了中等专业毕业生1200人,技术工人近6000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培黎工艺学校从创办起,在艾黎校长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带动下,形成了一套优良传统和学风,这就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忠贞不渝的坚定精神;艰苦奋斗、脚踏实地、勤俭办学的苦干精神;手脑并用、课堂教学同现场实践紧密结合的创造分析精神;为人民进步事业不怕艰辛,不计得失,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这些优良传统和学风是培黎石油学校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祝愿石油学校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和学风,进一步办好学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建设人才,为发展中国的石油工业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来自《纪念路易·艾黎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

在抗战烽火中历练成长的中国工合

唐保玲

70多年前,我们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经过国共合作,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夯实了重要基础。这是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是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的新起点。

也就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中,中国工合运动在烽火中兴起,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书写了光辉篇章,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乔治·何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共两党要员都参与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创建和领导工作,通过组织工业合作社,生产军需民品,争取国际援助,举办培黎教育,掩护党的地下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日斗争。在当时,工合被誉为“后方经济堡垒”。

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工厂停产,工人失业,难民如潮,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民族工业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在抗战前线,军用被服、药品、军火等物资日趋紧张;在后方,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用品难以为继,供需矛盾突出。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提出,

“没有工业——就没有国防”,埃德加·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策划并发起了“工合”运动。在大后方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重建中国的工业体系,尽快地弥补工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抗战和社会的需求。

1938年3月19日,在由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刘湛恩、胡愈之、萨空了、梁士纯、徐新六等人出席的一次“星一聚餐会”上,斯诺夫妇和艾黎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工业合作社的概略计划”。组织工业合作社,发展小型手工业或半机器工业,从事生产各种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供应军需民用。这种组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计划,不仅得到了宋庆龄、周恩来的“赞成和支持”,同时也得到国民政府的肯定和支持,通过宋美龄和英国、澳大利亚等在华人士的帮助,最终使这一计划得到实施。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汉口正式宣告成立。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兼任总会理事长,路易·艾黎代理总干事,并被任命为行政院的技术顾问。同年底,“工合”总会组织机构在重庆建立。中国工合《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适应抗战建国,发展工合事业,增加生产,树立工业基础为宗旨”。制定指导方针为“增加生产,供济军需民用”,“以适应抗战需要为第一,同时亦注意到社会方面之要求。”其历史使命为“建设经济国防,支持长期抗战,发展民族工

业,实行民生主义”。

中国工合成立后,先后在全国设立7个大区一级的办事处和140多个工合事务所和指导站,一条漫长的工合线,便一路从东南敌后游击区伸入西南、西北大后方,从蒙古高原直至云南山地,工业合作社星罗棋布地出现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绥远、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18个省的大半个中国广阔大地上。“工合”运动寓救济于生产,寓抗战于生产,支援军需和民用,这在当时是发展中国工业的一条新路,也是一项社会进步事业,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在中国工合成立后的整个抗战期间,当时大后方和解放区组建3千多个工业合作社,社员近3万人,安置劳动就业几十万人,产品有十大门类139种,举凡纺织、造纸、瓷器、制革、机械、印刷、矿冶、手榴弹、军服、农具等各类物资均有生产。“工合”的产业涉及到抗战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举凡国计民生,无所不包”。其中,生产纺织、榨油、印刷机器等机器及农具等12万余具,帆布、军布及各种民用布匹82450余万平方码,军毯250余万条,军服、军鞋等及日用服装1100余万套。以及大批的药棉、绷带、纱布、酒精和军械设备及机器配件,还造出大批手榴弹、刺刀,试制出各种型号的枪支。1939年,单是在成都和近郊各村里,就有大约五千人在纺羊毛,工合职工每天已可以出产一千二百条毯子了。分布各地的工合社用简陋的设备,克服各种困难,生产出大量物资,一方面源源运往抗战前线,在直接支持着抗战事业的同时,又不断销往后方市场,满足内地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这对于繁荣战时经济,供应军需民用,抵制日货倾销,粉碎和打击日寇“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经济侵华阴谋,成为“经济国防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战时中国经

济的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工合运动不仅在国统区迅速铺开,同时在中共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蓬勃开展。1939年2月,路易·艾黎首次到访延安时,向毛泽东同志介绍了工合的情况,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他向林伯渠、曹菊如提议在延安设立工合事务所,于3月26日,得到了当时负责中央财经领导工作的李富春的批准并正式成立。在短短的5个月中,延安事务所办起了15个“工合”社。同时通过与边区政府建设厅合作,将建设厅所属的137个生产合作社,按“工合”社的模式进行重组、扩充和技术改造,使之成为受“工合”指导的单位。这137个合作社,拥有28000多个社员和3万元以上的资本,它们的加入,大大壮大了“工合”在陕甘宁边区的力量。到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了全国最大的地区总分会,拥有的工人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工合工人的总和。”

陕甘宁边区原来几乎没有工业,到1942年9月底,“工合”在延安的发展,为边区的合作社作出了示范。到1945年7月,在黄河以北的华北各根据地先后建立了包括40余种不同类型的工业合作社253个,月产值43,750万元,极大地补充了解放区公营经济的不足,为解放区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坚持抗战,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中国工合是国际合作的产物,是国际友人和中国人民共同智慧的结晶。一大批国际友人为中国工合的设计、筹备、成立和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做出了重大贡献。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为工合的成立奔走呐喊,为工合的成长发展竭尽全力。在工合兴办过程中,更得到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鼎力相助。英国大使卡尔、大使馆秘书亚历山大和美国大使馆参赞文森等人都给予热诚的支持。特别是英国大使卡尔,亲自赶到武

汉,把兴办工合的计划面呈蒋介石、宋美龄和孔祥熙,并向他们专门作了介绍,力促国民党政府支持工合运动的开展。

经宋庆龄倡议,1939年6月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委员会,任务是代表中国工合接受各国、各团体、各界所给予的借款、赠款和物资、技术等。香港圣公会主教何明华担任该会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委员有宋子文、斯诺、艾黎、普律德和各促进会的代表以及港澳地区爱国人士、中外银行家、商业巨子和慈善事业家钟秉铎、郑铁如、何东等20多人,由陈翰笙担任执行秘书,陈乙明担任司库。

工合朝气蓬勃、同心协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传遍了世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卡尔逊就把自己负责指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突击队以工合飞行突击队命名,向战士灌输工合精神,激励他们英勇作战。1942年8月16日,卡尔逊的“工合营”高喊工合口号,冲向敌人阵地,在所罗门群岛以损失30人的代价奇袭日军据守的马金岛,取得了二次大战中美军首次两栖登陆战的胜利。这个胜利消息一下传遍美国,美国人心为之一振。由此,工合“gung ho”,被列为美语词条。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作为抗战时期坚持经济抗战、支撑战时生产与赈济难民的生产救亡运动,它兼容中外人士,联系国共两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各党派和国际人士在工业合作旗帜下放弃了彼此的政见分歧和阶级对立,超越了国家与民族的隔阂,竭其所能地支持国共两党和盟军的对日作战。工业合作组织堪称是各种抗日救亡组织中最具统战特色的组织之一,也是当时国内外抗日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纽带。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得到了国共两党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工合”总理事会于1938年12月在重庆成立时,它包括国民党方面的宋美龄、孔祥熙、王世杰、邵力子、翁文灏、蒋廷黻、

杭立武、张治中、俞鸿钧等;也有当时中共驻渝代表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等;还有各界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莫德惠等。这些人选反映了“工合”实质上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振兴经济、救国救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共产党始终支持“工合”运动。毛泽东在1939年9月23日曾指出:“中国工合在帮助恢复我们后方工业方面,它们所做的工作却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敌后战区最为需要,而且得到我们的军队、人民和政府最热烈欢迎”。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大力支持下,再加上延安事务所的努力和边区政府的大力扶持,工合运动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全国工合的一个典范。

“工合”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得到了许多进步人士及社会团体的大力支持。宋庆龄“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一事业,而且主动提出愿意做发起工合的保证人。她认为工业合作社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的然而也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部分即民生主义。希望通过“工合”这类组织,组织起民主的战线。她长期担任“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名誉主席,为“工合”募集了大批国际捐款和急需的物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宋庆龄始终关心和支持中国工合运动的开展。她为工合运动作出的功绩是无与伦比的,是举世卓越的。

中国工合运动是在“最具独特性、最有希望的统一战线中诞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蓬勃展开”。中国工合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组织动员国共两党、国内外各界人士投身工合事业,支持工合、援助工合、发展工合,服务抗战,为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工合”具有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利用工合组织,向工合派遣一批批党员干部在国统区“工合”中工作,既支持、推动了“工合”的发展,又通过“工合”的组织掩

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群众、组织群众,扩大党组织的力量和社会影响。当时,在中国工合,不仅在理事会中有党的领导同志,在西北、东南等地办事处还设有党组或分党组,不少地区的工合事务所由共产党员担任主任,一些地区的工合组织或合作社还成为党组织秘密活动联络站,不少党员以合作社成员的身份开展党的地下斗争。中国工合还适应战时需要,组织战地工合,向前线临时工厂输送技术工人,直接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为了给党组织进行地下活动和开展工作提供合法场所,1939年成立了和平工合事务所。我党利用工合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并成立和平党支部,将所属合作社作为中共东江后方特委与所属县委的联络地点,和平工合联合社、印刷厂也成为和平地下党委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不少党员以工合身份作掩护,进行党的工作。在和平县工合组织中就有党员100多人,成为工合事业的中坚力量。事实证明,工合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才得到发展,党组织也在工合发展中不断壮大。

为了抗击日寇,晋东南、皖南地区的工合还组建起工合游击队,许多“工合”社员,平时既是工人,又是民兵;战时不仅是支前劳工,有的还直接参战。1940年10月,日寇进攻云岭新四军军部时,丁桥烧炭合作社的社员积极配合新四军参加战斗,打退了日寇的进攻,取得了云岭保卫战的胜利。1941年5月,以晋东南工合事务所工作人员为主,组建起一支蟒山工合游击队,多次参与对敌作战,至今当地群众还念念不忘他们的英雄事迹。

也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工合的工作才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

工合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叶挺、贺龙、邓颖超、习仲勋、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多次接见工合创始人,参加会议或题词。邓小平盛赞工合创始人路易·艾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老同志、老战士”,“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83年3月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中国工合恢复组织活动的文件上明确指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曾受到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支持。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和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有机构,把技术工人和难民组织起来,从事日用工业品和军需品生产,并举办各种职业学校,培训技术人才,支援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工合’继续发挥了支援军需民用的作用。这个组织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这是对中国工合的充分肯定,是老一代工合人建立起的丰碑,也是工合事业壮大发展的动力源泉。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传承工合精神,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1983年中国工合恢复活动,重新起航。现在中国工合在多个省市建有地方工合组织,会员遍布全国各地,涵盖多个行业,实行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的大联合、大合作,走出了一条传承爱国传统、弘扬抗战精神、创新工合事业、推动社会发展的新路子。

今天,我们回顾工合在抗战中的奋斗历程,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驱,学习和弘扬爱国抗战的革命精神,努力把工合事业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就是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合作一起干,务实创新谋发展”,为实现“强国富民”的工合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本文来自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网站,作者唐保玲系中国工合原理事长)

怀念我的义父路易·艾黎

邓邦镇

编者按：近日，远在新西兰的邓邦镇老师给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发来了他的倾情之作：《怀念我的义父路易·艾黎》。捧读之时，观图之际，深挚而温暖的感情奔涌而出，一位高大而慈爱的父亲形象赫然立于心间，浮现眼前；这是一位耄耋之年的孩子对已故父亲深深的思念、呼唤和感恩，更是无数艾黎及培黎后代对路易·艾黎精神的赓续、传承和发扬！

邓邦镇，男，汉族，画家、雕塑家，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顾问，现旅居新西兰。1941年生于中国湖南，1961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7年为兰州市培黎广场创作设计完成了百米长的大型浮雕《路易·艾黎和培黎学校》。有不少作品被收藏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华侨博物馆、河南省美术馆、上海龙美术馆、美国堪萨斯大学、新西兰国家图书馆和中国驻奥克兰总领事馆等处。

我们现予以荣誉刊载，共沐深情大爱，同感永恒精神。

幼年初识义父

1991年5月29日上午，在我们正式把我画的油画《路易·艾黎和中国的孩子们》及我妻子卢波创作的《路易·艾黎》铜像赠送给新西兰之前，在新西兰国家图书馆的二楼大厅里，热情的主人神秘地请我们看该馆收藏的一些速写和素描画，问我们是谁画的。

我一时看呆了。卢波惊奇地说：“这不是你画的画吗！”这确实使我非常意外，没有想到在新西兰又看到我少年时期的画，而且保存得那么完好！其中有画南镇的水彩像，有画四镇、摩托和继禹等的铅笔速写，也有我画的陶渊明的素描插图等等。

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这些我十五六岁时画的画，是路易·艾黎30多年前寄给他在新西兰的亲友的，后来被收藏在国家图书馆里。

我自幼年失去了父母。1951年认识路易·艾黎之后，我和我的姐姐及两个几岁的弟弟就成了艾黎大家庭的一部分，从此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培养和照顾。他那无私深沉的爱，使我们这些饱受磨难的幼小心灵得到抚慰和温暖。从上小学、中学到大学，直至工作和建立家庭，我们的许多生活经历都是同路易·艾黎紧紧连在一起的。在几十年漫长的岁月中，他一直在指导、帮助我们成长。我的妻子卢波从大学时期起的26年间，也一直深得路易的关怀，特别是在事业上，他曾格外地给她支持和鼓励。我赠送给新西兰——艾老

的祖国的画，画的是艾伯伯和中国孩子们的一组群像。当年的我们正是像这组群像中的中国孩子一样偎在艾黎伯伯的身边，得到他最无私的爱。

那是我们到北京的第二年——1951年的一个寒冷的日子。伯母夏明领着我们去看望她的一位老朋友路易·艾黎。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对艾黎一无所知，现在也记不清是怎样去了，只记得艾伯伯的住处是在一条小街里的老式平房院中。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个戴着灰色八角帽、穿中国灰制服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他就是路易·艾黎。他的亲切和热情，使我们这些进城不久的农村孩子很快就忘掉了紧张和陌生。他的房子里不同于我们家，有地毯和暖气。一进屋路易就忙着帮我们脱去棉衣、棉裤，一面帮我们脱一面风趣地说：“28件衣服。”而后就是分发糖果和玩具画书等。我们这群孩子就像是进了一个游艺室，自由自在地在他的房间的各个角落玩耍。

这第一次和艾伯伯见面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都还很小，最大的是“摩托”，12岁，我是9岁，最小的弟弟四镇只有4岁当我们都坐在地毯上翻看他为我们准备的连环画时，艾伯伯和夏明伯母在一边坐着小声谈着话，一双蓝灰色的眼睛十分和蔼地看看这个孩子又看看那个孩子那次见面，艾伯伯已经50多岁了，可身体非常健壮。那天，他的情绪也非常好，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们一起玩。带我们做的游戏中让我最难忘的是他爬在地毯上，说自己是头大象，一会儿又说

是一匹大马,轮番驮着我们在屋里爬着走。他同时驮着我和南镇、四镇两个弟弟,一面在房间里转圈,一面不停地摇晃着。



1952年在路易·艾黎艾黎当时的住所,左一邓邦镇,后面是夏明伯母,右一艾伯伯



1953北京与艾伯伯(后排右一)在一起,前左一弟弟四镇,右一弟弟南镇,后排中间邓邦镇。



邓邦镇15岁时,路易拍的照片。

这个游戏使我们又紧张又开心,我们同长辈在一起从未这样亲热愉快地玩过。艾伯伯一会儿把臀部突然抬高,把头部贴近地面,一会儿又抬高头,降低臀部,我们一不留心就会滚落“马”下,逗得伯母哈哈大笑,这第一次同艾伯伯见面,在我的一生中是不可能忘记的,因为那是我童年的生活中非常特别和快乐的一天。自此以后,艾伯伯在北京的时间,我们常去他那里玩。他于1953年定居北京后,我们每个星期六下午从寄宿的学校回来就去艾伯伯的住处,在他那里吃饭、洗澡、换衣服,有时星期天他还会带我们外出游玩。我们大些后,星期天也常帮他做些事,如把照片装成相册;艾伯伯翻译一些中文材料时,我们给他读中文,他用打字机打成英文等等。

五十年代过春节,艾伯伯常会带我们去赶庙会。那时候北京前门厂甸和西四那边的白塔寺的庙会都是十分热闹的。一年他带我们去厂甸庙会,那天阳光明媚,完全没有冬天的寒冷,小

街两边摆满了各样摊子,有拉洋片的,有演木偶戏的,芦苇做的红红绿绿的风车在微风中争相发出咔咔声,有的摊位摆满了各种玩具,琳琅满目,特别那些木制的带有红缨的大刀和长矛特别吸引我们,我们最喜欢的还是小人书和放大镜之类的。赶庙会的人太多了,艾伯伯在前面给我们开路,每个人都紧拉着前面一个人的衣服,以免丢失,前面走不动的时候,艾伯伯就会喊“向后转!”于是就会后队变成前队,每个人双手扶着前面一个人的肩膀向前走。当我们走出庙会时,艾伯伯带的这个“队伍”已是有刀有枪,还有长串的冰糖葫芦。大家个个兴高采烈回家了!

鼓励我学绘画

我自幼喜爱画画,在小学阶段画了很多画,也做了不少雕刻,其中有些参加了国际儿童美术展览,有的还得了奖,如:用滑石雕刻的浮雕帆船《乘风破浪》,1954年在波兰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儿童美术展览”中获奖;一幅表现一群孩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工地前踢足球的画,在1955年世界保卫儿童委员会于日本东京举办的世界儿童画展中获奖。当艾伯伯知道我得奖的事后由衷地高兴。我很幸运,在他发现我的美术才能之后,在我几十年学习美术到从事美术工作的道路上,他给了我始终不渝的关心、鼓励和帮助。



1973年我们看望艾老。



卢波带新强、新黎和艾爷爷在一起。



1977年路易·艾黎80岁生日全家福。前排自左至右为:刘力、李德芬、段世谋、路易艾黎、张玉兰、徐静云、王涛。后排自左至右为:聂广沛、聂广涵、聂广淳、邓邦镇、卢波。



邓新强在听艾爷爷讲话,嘱咐他去山丹培校工作要注意的事情。



路易·艾黎抱着黎黎看书,邓邦镇在旁边。

我从上初中开始学习素描、水彩和油画等,画了大量的风景、静物和人物写生以及创作画。为此,几乎占去了我所有的课余时间。为了督促也是为了鼓励我,艾伯伯要求我每个周末向他交“作业”,把我在学校一周内画的画带回家给他看。他总是很高兴很认真地看我的每张作业,并说出他的意见,我的每批作业总能在艾伯伯那里得到很多鼓励。这些作业,要在他那里放一周的时间,他要拿给他的朋友们看,并把他们的评价也告诉我。那时,有位在中国治疗手掌关节病的澳大利亚朋友常来艾伯伯家。一次,我和艾伯伯同他一起吃饭时,艾伯伯把我的画拿给他看,这位朋友很赞扬我画的一些画分别时用汉语对我说:“你现在是小画家,还不是大画家,不要骄傲。”他回澳大利亚前曾通过艾伯伯转送给我一块十分贵重的手表。在我中学阶段著名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是艾伯伯的邻居,他看过我很多画,曾经当着艾伯伯的面邀请我跟他一起去画画,因语言不通我没跟他去:后来我长大些时才知道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失去了一次很难得的学习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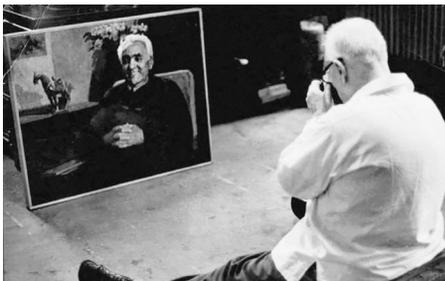
自上初中开始,艾伯伯开始让我为他写的书画插图。他像布置作业一样在我返校之前给我出题目,让我带到学校去用课余时间画,周末交稿。有时星期天,艾伯伯在餐桌上他惯坐的位置上为我准备好纸和笔,让我坐下听他讲一段他书中写的故事,并同我讨论如何画这幅插图,然后我就按他的意思构思画面。一般在两个小时内完成一幅单色的插图。我在读中学期间,艾伯伯让我画过陶渊明、杜甫、张思德、路易斯·斯特朗、乔治·何克以及一位医生的故事等插图。艾伯伯让我画这些插图,使我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为了鼓励我画画,也是为了培养我独立生活的能力,在

我为他画好一幅插图或其他画之后,他总是立即发给我“稿费”。书还没有出版呢,他说我给你存起来,没有多久他就给我办好了一个银行存折。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的存折。艾老说你需要什么东西我给你买很容易,但你不懂得爱惜。你需要的东西用自己劳动挣的钱去买你会懂得爱护。



1977年开始,中医骨科赵政英大夫(卢波从小的朋友)为艾老进行痛风病等骨科病治疗。



路易·艾黎为邓邦镇画的马海德的肖像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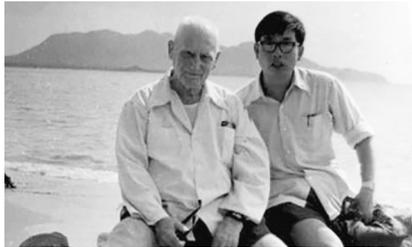
1979艾老带孙子邓新黎参观北京故宫博物院。



1979年在北京陶然亭公园,艾爷爷和亮(左一)丫丫(左二)黎黎享受冬日的阳光。



1982年在石家庄我们的家中,左一:艾老,左二:卢波,左三:邓新黎,左四:邓邦镇,左五:马海德,左六:邓新强,右一:卢波母亲卢苇



路易·艾黎和邓邦镇在大东海边。



1982年艾伯伯到当时我们在石家庄的家,自左至右为卢波的母亲卢苇、卢波、路易·艾黎、邓新强、邓邦镇、路易前面是黎黎。



1982年艾老考察河北省定窑古窑址,陪同的人有卢波、邓邦镇、艾老秘书李明泽等人。

艾老总是鼓励我多到外面旅游,一方面可以画写生,一方面可以了解社会。我就用我的稿费和艾老支助的钱在假期跑了不少地方。有一次和一位同学骑自行车去天津,塘沽,冒着一会太阳一会大雨跑了一百多公里。还有一次去湖南,下了火车我靠着地图和指南针徒步沿着南岭广东和湖南交界的地方走了几百公里。回到北京我去看艾老,一方面给他看我写生的画,一方面给他讲我的见闻。他总是很感兴趣的听。

艾伯伯对我画画的鼓励是很多的,最令我难忘的一件事是在1956年的一个节日的晚上,那时他还住在老北京饭店,

我从阳台上远看天安门广场灯光闪烁的夜景十分迷人,于是拿出油画箱打算在阳台上画一幅夜景写生。艾伯伯忙着为我接电源,在我身边摆上椅子、放上台灯,忙了好一阵子,可是灯光的位置还是不合适,最后他干脆自己用手举着灯照着我画这幅画。我画了一个多小时,他就这样站在我的身边为我举了一个多小时的灯。那时我仅14岁,还不懂事。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爱护和关心,一直是我学习和工作的巨大动力,直至今日,我闭上眼睛,当年艾伯伯为我举灯的情景仍浮现在眼前。他的这盏“灯”,照亮了我生活的道路。

三年困难时期,我十七八岁,正在中央美院附中学习,每年会有两个多月去农村劳动和写生。因为食品少,身体受到一些影响,艾伯伯对我的身体担心,我总是说我的身体很好,他说:你的脸上都出皱纹了,头发也枯了。周末我从学校到他那里,他总想法给我补点营养。

那两三年,艾伯伯从国外回到北京,总会用一个白色的藤箱带回些吃的,到星期天带着我们这群孩子到颐和园玩,租一条船,有时我们中的男孩会下湖跟着船游泳,到中午大家就在船上和船工一起把箱子里的美食吃光,过一个快乐的星期天。

我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以后,虽然还是住校,但离艾伯伯更近了,因此他常常出远门时会请友协的传达室老汉到学校去找我,艾伯伯见我来了,就会放下手中的事情,坐下来同我聊天,然后在一起吃晚饭,我看到满屋的没有装好的行李,不安的说:我来了就耽误您准备的时间了,艾伯伯微笑着说:你来了我才能休息一会,不然我一个人坐着有什么意思?又说:别人出差都会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我出门只能和你吃顿饭,别的孩子都太远了。艾伯伯总是牵挂着我们,每次回来会给孩子带礼物,他对每个孩子都记得清楚。

我十七岁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二十岁考上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那一年成千上万的学生想考中央美术学院,我们油画系只收了4个学生。所以我能考上中央美术学院艾老非常高兴。他看我头发有些长了,就说你要进大学了,我来给你理个发吧,那么多年都是他给我理发的,这次理完发我要去学校了,艾老说你先别走,然后就拿了一顶他自己的帽子扣到我头上,那时是九月初刚开学,天气并不冷,我说我不冷不用戴帽子,他说会感冒的,戴上戴上。我只好戴着帽子去学校,走出了一头汗。回到学校我摘下帽子扔到床上就跑去操场玩去了。没想到同学看着我笑话我,他们说你理了个什么发啊!像狗啃的!我一听不知怎么回事,跑回宿舍找了个镜子一看我的头发确实理的怪怪的,不像过去艾老理发的样子。第二天我去艾老家,对他说我昨天为什么让我戴帽子了!艾老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哎呀,我想你上大学了,我想要给你理个分头,可是我的技术不够好。我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系,艾伯伯心里有多么高兴!

(未完待续)

艾黎与何克：诗歌中的挚友情

刘国忠

路易·艾黎(Rewi Alley),新西兰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在推动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过程中,艾黎与英国青年乔治·何克(George Hogg)在武汉经美国著名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介绍认识。40年代,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两人并肩携手,合作共事,相处了整整五个年头,成了亲密无间的挚友。1945年,何克因病在甘肃山丹逝世。何克逝世后,艾黎不仅把何克喜欢的诗刻在墓碑上,还通过诗歌表达对何克的思念之情。

在墓碑上镌刻何克喜欢的诗句,表达对何克精神的赞扬

1945年7月22日何克去世后,艾黎亲手为他竖起墓碑,并将何克喜欢的、英国从军诗人朱利安·格伦费尔(Julian Grenfell)《投入战斗》(Into Battle)一首诗中的几行刻在墓碑上:

“色彩绚丽的生命啊! 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世了,从此不再奋战;
在战斗中
逝者的生命,却更辉煌灿烂。”

朱利安·格伦费尔于1888年3月30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先后在伊顿公学(Eton)和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

接受教育。离开牛津后格伦费尔就到军队服役,这是他长久以来的夙愿。一战爆发前,他在印度和南非服役。一战爆发后,他被派往弗兰德斯(Flanders)。1914年11月,格伦费尔因出色的侦察能力而获得了杰出服务勋章(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获奖之后,他被授予了一个参谋职位,但他选择继续在前线服役,因为他相信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在战争期间,格伦费尔写了大量的信件和日记,直到他在战斗中受了致命的伤。《投入战斗》,这首诗写于1915年4月,1915年5月26日,格伦费尔死于头部创伤,年仅27岁。《投入战斗》在格伦费尔死后的第二天出版,是战争期间和战后最受欢迎的诗歌之一,这是一首歌颂战争初期英国战斗精神的颂歌,这首诗在当时很流行,它使当时的许多人受到鼓舞。从牛津大学毕业的何克有着浓郁的校友情结。他非常喜欢他的校友朱利安·格伦费尔《投入战斗》这首诗中的这几句。当他投身中国革命的工作没有进展的时候,何克曾想为什么不在自己的祖国投身战斗?为何不驾驶一架轰炸机去轰炸德国?在墓碑上刻上他最喜欢的这几行诗,无疑,是对何克最好的纪念。诗歌表达对战友的思念之情。何

克去世后,艾黎写了下面这首诗:

沙漠的晨曦,
穿过窗户的小格,
照射在他喜爱的皮肤黝黑的三个小鬼身上。
他们没有穿衣起床,
却在破旧的藏毯上嬉戏。
晚上,
三个黑呼呼的脑袋凑在一起,
手脚东伸西支,
把一天的欢乐化为梦境。
还有他辛辛苦苦装修的马达,
发着隆隆吼声,
那一张张全神贯注的脸庞凝视入神。
金属注入沙型,
化铁炉迸发出火花,
庙宇的图案在地毯上成形,
年轻的脸庞现出创造的欢乐。
他爱这一张张脸儿,
因为他们象征着希望,
尽管他们不无缺陷,
因为他们代表着奋斗以及奋斗带来的欢欣。
是的,他爱他们,爱他们啊!
不论是性情急躁的张志汉,
还是老成持重的杜安芳。
门外,印度塔在枝叶扶疏中隐现,
屋里,织布机噼啪作响,织着冬装。
织袜机呼呼转动,
铁工车间在有节奏地叮叮当当,
火花点亮了古老的佛像,
这一明代正统年的石雕。
妙手精确地在制图板上操作
图纸上现出了机床。
制革车间一片欢欣,
人们正计划鞣皮用的新缸
还有那些陶窑周围的人群,
和乔治一样

兴致勃勃,欢天喜地。
思想忽然开窍
象点缀在大庙墙上的荷花花瓣舒展。
清洁和自如的四肢,
在夏日照射下制革,
这是受着头脑周密思考支配的四肢。
看着这一切,
为取得这一切而付出的汗水和辛劳,
全部得到了补偿。
可是乔治却累得嘴上起泡。
于是他过完了最后苦恼的日子
“不要怕”,医生在他临终前
刻板地重复着,
“我没有怕啊”,他迅速作了回答。
随即他离开了我们
去了,他那强健而又不咄咄逼人的身形,
走进了人们称作死亡的雾般的山谷。
他生前所爱的人接过了他留下的事业,
把他埋在一条河边,
这条河他们称之为弱水河,
它源起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
消失在戈壁滩……
然而他并没有逝去。
他好像永远在我们周围,
总觉得一抬头,
就可以看见他在身旁。
或是听到他穿草鞋走在路上,
他好像正操着悦耳的河南口音
解决着每天每日出现的问题。
我们会一下子听到、看到他的音容,
从他那些孩子们的身上,
从他们对未来美好日子怀抱的希望上。
于是我们怀着悲痛和惆怅的心情,
谦卑地坚定我们的决心
借助他的力量,
从恍惚中醒来

又接过了他的工作

这首诗,不仅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关心学生,努力工作,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的何克,也展现了艾黎与何克的真挚情谊。

何克是由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激情浇灌而成的坚实大树

艾黎说,从1937年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前不到一个月的这段时间,对于乔治·何克来说是度过了整整一生,这颗幼小的树苗,经中国革命的鲜血和激情的浇灌,已经长成了坚实的大树。何克去世二十年后,在写与何克在一起经历的往事时,艾黎想起了一千二百年前唐朝不朽诗人李白的诗作:

宋国梧台东,野人得燕石。
宋人枉千金,去国买燕石。
夸作天下珍,却哂赵王璧。
赵璧无缁磷,燕石非贞真。
流俗多错误,岂知玉与珉。

这首诗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创作的组诗《古风五十九首》之一。此诗是作者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发出愤怒的呐喊:庸俗之人哪有慧眼,哪里分辨得出玉与石?艾黎说,他与何克的初次相遇就深信何克当然知道什么是玉,什么是珉。何克当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座傲然挺立的山峰。

傲然挺立的山峰

南山高峰傲然耸立,
山下冰河闪亮晶莹,
山河守着一位青年,
他的灰烬和为着
自身信念捐躯的人们
溶合在一起。
千百年来,
多少人在这里葬身?
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旅行家,
征战沙场的戍边将卒,

还有那

气吞山河的红军战士。
黄昏日暮,
高山后面,红光普照着古老的丝绸之路,
悄然抚慰着溪边的小墓。
晚风习习,
飘荡着少年们的歌声,
这些就是他所爱戴
并与之一起战斗的少年啊!
他们的歌声给他带来慰藉

何克一生的经历确实是丰富和有意义的,他学习了中国革命,并在参与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成长。他是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纽带。他的精神将能鼓舞更多的人从事真正的国际主义事业。何克是“好同志”,“为同代人的幸福,竭尽所能。”何克去世后,艾黎多次走到他的陵墓前,默默地悼念,这是一位多么好的同志啊!他写道:

好同志,
鞠躬尽瘁,
拼搏一世的好同志,
已化作一缕青烟,
袅袅入云端。
晨曦丹霞,
团团,翩翩,
渺渺,灿灿,
来了,他来了。

他来到我们身边,走进我们的心田……

80年代艾黎积极推动山丹建立培黎图书馆以纪念何克和为培黎事业做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在参加图书馆开馆典礼时,艾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人的一世何等短暂,
就象一阵风一掠而过。
有的人留下万贯家财,
让懒散的子孙肆意挥霍。

而真正的富有，
应该是为同代人的幸福，
竭尽所能，
除此还能理解成什么？ [4]

何克，这位好同志，为了同代人的幸福，贡献了自己的一切，是真正富有的人。培黎图书馆的建立不仅为山丹县的发展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为进一步发展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在投身中国

革命的过程中，艾黎与何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成为了挚友、忘年交、革命战友。何克的逝世，令艾黎深受打击，但他化悲痛为力量，把对何克的情谊化作了继续推动他们所热爱事业的行动，使何克的国际主义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作者刘国忠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常委，甘肃省山丹培黎学校高级讲师，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 培黎讯息

王小龙大使为即将开幕的“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作序

近日，王小龙大使为即将开幕的“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作序。

王大使指出，艾黎先生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受爱戴，是中国老百姓评选出的十大国际友人之一。96年前的4月21日，艾黎先生来到中国，从此与中国人民结下不解之缘。他在华工作六十载，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新两国的友好合作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对人民充满着热爱，值得我们永远怀念。他留下的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传承。

王大使强调，去年，中新两国以多种方式共同庆祝了两国建交50周年，今年是两国关系迈向下一个50年的开局之年。希望通过本次展览，我们共同缅怀艾黎先生，发扬艾黎精神，为中新友好合作凝聚更大的力量，携手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王大使并感谢主办方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为此次展览付出的辛勤努力，感谢邓邦镇先生、卢波女士为此次展览提供展品。“路易艾黎生平纪念展”将于4月21日-23日在惠灵顿毛利文化中心举行。



Rewi Alley Memorial Exhibition

路易艾黎 生平纪念展

21-23 April 2023
2023年4月21日 - 23日

Wharewaka Function Centre, Wellington

主办单位：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
支持单位：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
承办单位：新西兰和平之友联谊会
协办单位：新西兰华人社团联合会、
新中商会、新西兰湖南总商会
策展人：邓邦镇、卢波

工合运动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独特贡献

——以抗战时期西北工合妇女工作为例

董 沼

在抗战中崛起的中国工合运动，不仅是一场永载中华民族史册的战时经济运动，而且一场意义深远的民主革命运动。美国著名作家海伦·斯诺在其著作《中国为民主奠基》中认为，“工合”运动是中国从基层建立民主的一种探索。

抗战时，西北工合的妇女工作卓有成效，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独特贡献。

一、成立中国工合唯一的西北区工合妇女工作部，广泛深入开展唤醒、教育和组织工作

工合西北区妇女工作部于1939年4月在宝鸡成立，这是在中国工合七大区里唯一的专门从事妇女工作的机构。机构领导成员有主任任柱明，共产党员、妇女部教育股长刘士范，新加坡爱国华侨周佩璜，任柱明侄女任秀芝，原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管理员方纪等。同时，还制定了《妇女工作部工作计划纲要》；《纲要》明确了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妇女工作的对象、妇女工作的区域及推动工作的方法等。工合西北区妇女工作部的成立，标志着工合运动一开始就超越了战时经济生产运动的范畴，具有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显著特征。

1、树立明确而远大的政治目标。周佩璜

原是新加坡华侨，抗战爆发后，毅然回国参加抗战。1939年3月，她与任秀芝结伴从湖南出发，历经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来到宝鸡，在宝鸡城郊一带的合作社中积极推动合作教育。据西北工合办事处1938年12月15日出版的《工业合作》中记载：“十里铺一带，为武汉工友集中组织合作社之地域。……男女社员，不下二百余人，先后均在积极工作。关于合作教育亟待推动，以增厚其对合作之兴趣，及提高其工作效率。特于本月十日晚七时，由合作股招请新运总会管理员方纪女士，及本处杨子厚、傅楷、陈彦等君，讨论应进行之方针及步骤。”在她们的积极推动下，西北工合的妇女工作艰难但富于成效地开展起来。

周佩璜在1939年5月1日出版的《工业合作》发表《西北区妇女工作的萌芽时期》一文，阐述了工合西北区妇女工作的远大政治目标和意义：“妇女要谋自身的解放，非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属于民族一部分，同时整个民族如果得不到解放，妇女要想单独得到解放是绝对而且永远没有可能的。反之，中华民族要求真正彻底的解放，如果还不把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从层层压迫下解放出来，就是无形中放弃一半斗争的力量，要得到真正的

解放,也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可以证明: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只有同时并进,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两者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理由。”

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正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妇女运动时,将推动广大妇女走出家庭从事集体生产作为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1941年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关于妇女工作的指示》就指出:妇女在家庭、社会上没有地位,正是由于妇女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和没有地位,因此,“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从生产中广泛组织妇女,是领导妇女解放及妇女组织工作中一个基本趋向”。这就从政治上明确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性。中央妇委于1943年2月出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以妇女参加生产为解放妇女的核心利益,把改变妇女的经济地位作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必由路径。

工合运动的抗日救亡使命,决定了工合妇女工作将妇女解放与抗日救亡紧紧联系在一起。遍布全国18个省份的3000工业合作社,将数以万计的妇女吸引、团结起来,从事集体生产、接受教育和参加其他抗日救亡活动,成为民族解放斗争重要力量,其历史贡献彪炳中国妇女运动史册。



漫画:巩固大西北,要建设西北国防工业

漫画:青年朋友这里需要你

西北工合的宣传画

《西北工合》1939年创刊于宝鸡,由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编辑委员会编辑

2、制定务实而具体的妇女工作计划纲要。1939年5月1日出版的《工业合作》第8、9期合刊登载了西北工合办事处《妇女工作部工作计划纲要》是一份正规的官方文件,展示出工合妇女工作的合法性、规范性和专业性,可以看作是我国妇女运动史上一份珍贵的政治性文件。这份《纲要》针对当时深受封建桎梏而贫穷、落后的西北妇女群体,现状,有针对性

的提出了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工作对象、工作的区域和推动工作的方法。《纲要》明确指出：“工业合作运动，是一种新的运动，本部除负推行西北妇女工业合作运动外，还须负担妇女教育，及儿童保育等工作……”《纲要》简明扼要、求真务实、内容具体，有很强的指导性，同时反映出当时开展妇女工作的深远意义。



女社员集体宿舍

3、构建生产、训练和教育有机结合的推动工作机制。正如《纲要》里所指出的，历史上，西北地区的劳动妇女完全被“旧礼教、宗法社会和封建势力的铁链把她们束缚的像死人一样”，在贫苦、愚昧的生活中挣扎但又安于现状和麻木不仁，所以“唤醒她们，教育她们，组织她们”就成为工合西北区妇女工作所要面临的一项系统性工程。西北工合的妇女干部肩负妇女解放的崇高使命，利用工合的影响力，借助地方基层政权等，通过调查、接近、个别谈话和家庭拜访等各种方式进行动员和唤醒，以组织合作社、开设识字班（包括儿童识字班）、开办生产技术训练班（主要是纺织训练班）、设立儿童寄护所和儿童保育院、组建妇女俱乐部等形式，将生产、训练和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妇女工作格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抗战开始，宝鸡成为西北重心的日益突

出，妓女数量的突增，还设立特种妇女训练班，“先施以战时教育，然后使她们学习生产技术”，获得一定的职业技能，能够自食其力，脱离“火坑”。可见，工合妇女工作是面向全体妇女大众的全新的妇女解放运动。



纺织训练班女社员出早操

在工合妇女工作中，最具工合特色的就是融生产劳动与职业技术教育为一体的女子职业训练班。自古以来，牛郎织女般的封建小农生活是中国劳动妇女的写照。工合开办以学习新式机器纺织技术为主要课程的纺织训练班，吸收广大劳动妇女走出农家，抛弃过去两只手防线织布的传统而学习现代工业生产技术，本身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宝鸡纺训班集体授课，分组学习，半军事化生活，课程除了纺织技术，还开设识字、算数、珠算、合作常识等课程；同时，定期邀请专家举办讲座，拟定“四个教育中心问题”：（一）纺织训练班的意义；（二）合作问题；（三）抗战问题；（四）妇女问题。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有早操、唱歌游戏、文化娱乐晚会、语言练习会、读书会等。1939年7月1日出版的《西北工合》，刊登了妇女部主任任柱明撰写的《西北区之妇女工作》一文中生动记述了纺训班妇女们的思想觉醒和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纺织训练班对于这一群乡姑，是一个新的世界。在这里她们见到了这许多从来没有见

过的人和事,在这里她们也听到许多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她们精神变的愉快了,活泼了,她们的动作变得敏锐了,她们的希望也变得远大了。无论你问起哪一个:“毕业后打算做什么?”她一定毫不踌躇地说:“我要工作”,你再问:“你愿意如何工作?”回答一定是:“我愿意组织合作社,大家一起来工作。”她们大多数人都是希望出去后组织合作社,有的现在已经纠合伙伴了。在这里她们更养成了自动群动、自助互助的精神。



工合医院给儿童打防疫针

二、西北工合妇女工作的主要内容

1、教育、动员广大妇女参加生产,投入到抗战建国运动之中。西北工合妇女工作部干部方纪在《宝鸡妇女工作之近况》(《工业合作》1939.6.1)中写道:“神圣的民族抗战,给与了每个国民以重大的任务,为着完成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我们不能不对在抗战过程中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建设,赋以更大的切实的努力。而教育民众及动员民众,尤其是动员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女同胞参加生产,更是我们目前应该深切注意的工作。”由于西北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广大劳动妇女深受封建家庭束缚,加之没有文化和观念守旧,教育动员工作艰难而复杂。西北工合妇女工作部自觉肩负起妇女解放的历史使命,从家庭访问、调查开始,通过接近、谈话、施教等形

式开展启发、动员工作,适时开办妇女儿童识字班、妇女合作社和妇女俱乐部。识字班、合作社、俱乐部三位一体,相得益彰。识字班起到吸引、启发和组织作用,合作社增强了抗战救国获解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俱乐部给她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妇女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2、大力开展职业技能训练,吸引广大贫苦劳动妇女参加工合运动。

任柱明在《西北区之妇女工作》(《西北工合》1939.7.1)一文中写道,由于地处西北,经济文化发展落后,广大农村劳动妇女目不识丁而又深受农耕家庭文化的束缚,千百年来不出家门,用双手纺线织布;但她们身上所具有的吃苦、耐劳、虚心、忠实的“美质”,正好符合工合对劳动者的要求。“采用新式机器,运用合作的方式”,加以训练,“借以扩大并树立当地农村妇女工作及妇女职业的基础。”这是吸引广大贫苦劳动妇女参加工合运动、投身抗战的必由之路。

正是基于西北工合领导人卢广绵所倡导的“从工合运动中发展妇女工作”的理念,西北工合通过举办妇女纺训班来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养和训练,一方面从根本上提高了广大妇女的劳动技能,另一方面为妇女工作培养储备了干部。

妇女纺训班集文化启蒙、技能培训和思想教育为一体,采用集体授课、分组学习和个人实训的培训方式,通过半军事化的生活管理和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给学员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卢广绵夫人姜漱寰女士1933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数学系;当年12月于卢广绵结婚。1938年春到上海参加爱国团体“星一聚餐会”的工合设计委员会(后改为工合上海促进委员会)工作。1939年底赴宝鸡,后担任西北工

合妇女部视察、主任与教育福利课课长。1940年6月,撰写了中国工合运动史上第一部专著——《工合运动在西北》,是研究工合运动的第一手珍贵资料,是工合学术研究的开创者。这部著作包括“绪言”部分共7章,其中第3章“工作现状报导”第5节“提倡妇女工作”,专门介绍了西北工合妇女部的工作和进行生产技术训练的情况。根据她统计1939年4月到1940年2月间,开办纺织训练所3所,学员130名;纺织传习班7个,学员1150名;女子职业训练班1个,学员20名。

生产技术训练的蓬勃开展,不仅使广大妇女获得了步入社会的职业技能,而且帮助她们认识到,参加工合运动,就是“为谋祖国的独立自由,为谋妇女的解放与幸福。”



工合训练班的识字课



女学员们围坐一起就餐

三、西北工合运动妇女工作的意义

1、西北工合妇女工作是抗战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功实践。中国工合运动自始至终都把团结、教育、发动广大劳动妇女参加生产作为抗战救国的重要使命和任务之一。西北工合妇女工作部深刻认识到妇女在工合运动中的“半边天”作用,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千千万万劳动妇女走出家门,积极投身到抗战救国的时代大潮中,将自身的命运与国家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紧紧联系在一起。

西北工合领导人卢广绵1940年6月16日在宝鸡妇女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从工合运动中发展妇女工作》的讲话,该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了工合妇女工作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工合妇女工作“要深入到广大的妇女群众中去”：“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广大的西北妇女,我们的工作任务是要唤起几千万的西北妇女同胞来共同参加生产工作,我们只成立几个工合小学或识字班,是绝对不够的。大家本身是妇女,为妇女求解放,是本身的义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只解放少数人是不够的,应深入到妇女大众中去。”“今后我们应如何利用已有基础,去办理夜校,识字班,号召广大的女同胞来读书,受教育,或亲去访问她们,在生活上帮助她们,开导她们,引导她们学习技能,参加生产。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真的深入农村,从抗战建国中完成妇女运动的使命。”

1941年3月1日出版的《西北工合》第4卷第5期刊登了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特辑文章,如甘和媛在《三八节与工合运动》中认为工合运动为妇女解放创造了条件,妇女在参加工合后应当理解“妇女运动是国家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一环,妇女只有在国家民族得到独立之后放才能得到解放……妇女参加生产工作,就是将妇女运动得理论从实际中做起。”喻林炎则关注妇女的教育问题,认为对妇女得

教育要从“社会立场”“时代立场”和“工合立场”三方面进行,从而“发挥每位妇女得内在力量,把握住时代,以建设社会经济,改造社会为最要目的,然后妇女的解放与幸福,才可求得。”其他文章也从不同角度表达对妇女们的节日庆祝;同时,《西北工合》还以刊登诗词、歌曲等形式祝福妇女工作者。

1941年5月1日出版的《西北工合》“劳动节专号”中也肯定了妇女的贡献。舒澐在《纪念劳动节与中国妇女》中认为,妇女在抗战建国的背景下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贡献,妇女们应当在知识教育、宝育儿童等方面继续加强工作。刘克顿看到“因为战争的怒潮唤起了广大的妇女同胞,实际的来参加各项抗战建国的劳动工作,显示了伟大的力量,才获得了她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2、西北工合妇女工作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将“妇女运动与工合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从工合运动中开展妇女工作”。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是,1940年6月16日至25日,宝鸡事务所妇女工作股在集硖石村工合小学召开了首次工作会议,到会的有燕京大学校长、中国工合顾问梅贻宝先生,西北工合办事处主任卢广绵及妇女干部30余人。开幕式上,卢广绵作了题为《从工合运动中开展妇女工作》的报告;西北工合妇女部主任任柱明以《妇女工作会议的意义》为题致开幕词;卢广绵夫人姜淑寰女士做《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概况》报告;西北工合妇女工作部做题为《宝鸡一年来妇女工作及其展望》总结报告。会议最耀眼的就是安排了“妇女运动与工合运动”的专题讨论议程。

任柱明在会上所致开幕词,深入阐述了西

北工合妇女工作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责任和使命,指出:“在争求民族独立自主的今天,妇女运动的任务,不仅是争求妇女本身的独立与解放,尤须致力于民族独立自主而奋斗,必须立即注意并促成妇女的独立与解放,唯有使妇女有要求独立与解放的自我觉悟,才能使妇女大众”

1940年7月16日出版的《西北工合》专门出了“妇女工作会议特刊”,这份特刊共49页,详细报道、记录了会议的日程、讲话、报告和随笔等。特刊里,刘克顿写的《我们的一周间》一文热情洋溢地写道:“呵!这一周是我们生命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周呀!”“我们在工作日程里有邀请专家演讲一项,如刘大作先生讲教育问题,王亚平先生讲写作方法,高乃同先生讲国际问题,罗子为郑长家先生讲合作问题,每次都给我们许多珍贵的材料,使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了许多新的问题,除这以外,我们还有两个专题讨论:‘工合运动的前途’,‘妇女运动与工合运动’这两个题目。因为和我们关系密切,所以讨论时,都争先发言,各抒己见,滔滔争论着。”

这些描述生动展示出在工合运动的磅礴大潮中获得新生的广大劳动妇女焕然一新的精神风貌。

西北工合妇女工作在工合运动史上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抗战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缩影,生动反映出工合运动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独特贡献,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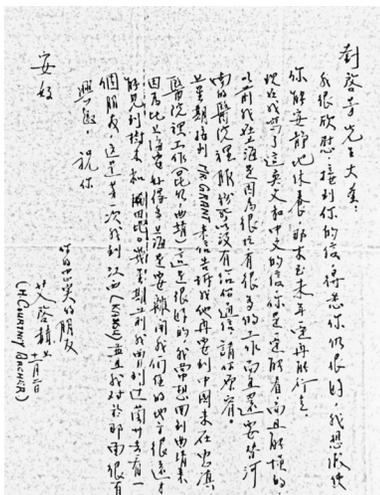
(作者:董沼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副主任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

关于新西兰友人艾启赫的史料(四)

秦泉安

编者按：上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先后有来自8个国家的30名外国专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护士来山丹培黎学校任教和工作。艾黎在自传中写道：“除了始终存在的财政困难之外，我们还发现，要想动员中国教师去荒凉的西北工作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学校虽也有中国教师，但如果没有约30位来自8个国家的外籍教师的协助，学校是办不好的。这些外籍教师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的国际组织派来的。有些时候，我们感到走投无路了，接着障碍被克服了，外援来了，学校才得以继续办下去。何克接办双石铺的培黎学校之后，设法请来在公谊服务会派到中国工作的恩迪·布雷德和罗伯特·纽威尔来协助工作，在山丹招聘后勤工作人员就更困难。公谊服务会又一次帮忙，派新西兰会计师考特尼·阿切尔(艾启赫)来协助。考特尼的事业心很强，他建立起学校的财会制度，还培养了一名工作人员。”除了艾黎、何克外，这些外籍教师的史料非常罕见。工合运动研究学者秦泉安先生翻译、整理了4份有关艾启赫的珍贵资料并发来本刊，现刊发第四部分，以飨读者。

1946年艾启赫写给
中国朋友刘启芳先生的信函



信函内容整理：

刘启芳先生大鉴：

我很欣慰，接到您的信，得悉你仍很好。我想假使你能安静地修养，那么到来年一定再能行走。

现在我写了这封英文和中文的信，你是一定能看，而且能懂的。以前我在上海是因为很忙，有很多的工作，而且还要替河南的医院里服务，所以没有给你通信，请你原谅。

上星期接到 Mr. Grant (格兰特先生) 来信告诉我说他再要到在云滇医院里工作(昆明、曲靖)，这是很好的。我常想回到曲靖来，因为这里比上海要好的多，上海是要离开，我们住

的地方很远才能见到树木和田地。几个星期之前,我曾到过兰州去看一个朋友,这是第一次我到江西(Kansu)并且我对那里很有兴趣。

祝好

你的忠实的朋友
艾启赫 上
(H. Courtney Archer)
十一月二日

整理者注:

1.没有找到此信件中提及的英文原信;没有具体年份;此封书信用非常漂亮的中文书写,还有艾启赫先生的中英文签名,但个人觉得艾启赫先生的中文水平、中文书写水平没有这么高。估计是当时请人代笔的,中文有可能是从英文翻译过的。

2.信中的“刘启芳先生”数据需要查找;可知道,刘启芳先生给他(艾启赫)前面写了信件,但不知原文是英文或中文,故也不知道刘启芳英文状况,或也不知道其身份;

3.此前,艾启赫曾在上海工作,且工作很忙,“还要替河南的医院里服务”。

4.上周接到格兰特先生来信,说他“在云滇医院(曲靖)”工作,而艾启赫“常想回到曲靖来”,可以看出,艾启赫先生曾经在曲靖工作过,且刘启芳先生可能在曲靖。

5.“几星期前,我曾到过兰州去看一个朋友,这是第一次我到甘肃(原文写成江西;拼音写成Kansu),且我对那里很感兴趣。”说明,这是艾启赫在去山丹培黎学校正式工作之前。经查,艾启赫是1946年初到培黎学校开始工作的。故,此信应早于1946年。

6.这封信原件是整理者在网上淘到的。

■培黎讯息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 与培黎展览馆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5月19日,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与兰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举行了“兰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学实践基地”和“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兰州城市学院培黎展览馆红色教育共建基地”挂牌仪式。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馆长袁志学和兰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路易·艾黎研究中心主任石虹先后致辞,并共同为基地揭牌。活动中,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与兰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签订了“馆校共建协议书”,进一步明确了馆校共建的目

标、内容和形式。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及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职工共50余人参加了活动并参观了纪念馆。



路易·艾黎在金台

张占勤

初夏时节,陪一帮外地文友来到宝鸡市金台区长乐塬抗战遗址公园采风。在申新纱厂的窑洞车间里,一尊路易·艾黎的半身塑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塑像的四周被玻璃罩着,塑像的底座上镌刻着“路易·艾黎(1897-1987)”和“工合”的标识。塑像中的艾黎目光深邃,凝神静思,似乎还在谋划着工合的发展大计。文友疑惑:难道艾黎与申新纱厂有关系?我说,艾黎不但与申新有关系,而且还在金台住过一段时间呢。

早在工合成立之初,作为行政院技术顾问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代理总干事的艾黎就看中了宝鸡。他认为动员武汉的工业企业撤往宝鸡,有利于工合运动的发展。为此,他设法找到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和宋美龄说:“如果政府不准备把武汉的工业留给敌人,迁到西北是最有益。这样既有利于工业合作运动,又可以减少大量难民对政府的依赖。”宋美龄和端纳都同意实施这个计划。1938年8月4日,艾黎陪同端纳和宋美龄前往位于汉口的申新纱厂。宋美龄质问厂长章剑慧为什么不迁厂,并警告厂方:“拆迁是政府最高领导的决定。”“去重庆的长江水路已经拥挤不堪,没有船只运送机器,陕西的宝鸡比较安全,往西去的铁路还在通行,政府可以设法调拨车辆。”申新纱厂迫

于压力,只好按照指令迁往宝鸡。据统计,从武汉等地迁往陕西的企业共有42家,其中陕南2家,陕北1家,其余的39家都在关中。申新迁到宝鸡之后,为了防止日寇空袭,申新的经理李国伟提出了开山挖洞建造地下工场的设想,路易·艾黎还被邀请参与了窑洞车间可行性论证和方案设计。



“工合”的三位领军人物:路易·艾黎(中)、吴去非(左)、卢广绵(右)

宝鸡成为“工合城”,路易·艾黎更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38年8月下旬,当西北工合办事处主任卢广绵在宝鸡成立了第一个合作社之后,艾黎就赶到宝鸡。这个合作社由七名

难民铁匠组成,取名为宝鸡大华手工铁器合作社,位于金台区大华巷,现在改名为胜利路。宝鸡大华手工铁器合作社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工业合作社。

抗战初期的宝鸡城非常小,就是现在的金台区中山西路以及附近的几条街道。艾黎来宝鸡,没地方居住,就在西门里租了一套房子。据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艾黎就住在今天的金台区西街小学对面临街的二楼上。这里离西北工合办事处(如今的金台区世福大院)非常近,便于工作。由于城市改造拆迁,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艾黎旧居和西北工合办事处的原貌了。

在旧中国,人们面对灾难或者困境,总是说“没办法”,而艾黎的口头禅却是“有办法”。艾黎不论走到那里,总能给人带来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染力和自信心。艾黎来到宝鸡的消息一传开,人们争相来访,他们中有许多是工合社员,还有一些指导员和管理员,从早到晚,接连不断。每位来访者几乎都带着一肚子委屈或者问题,艾黎常常将自己珍贵的咖啡拿出来招待。许多麻烦事情都需要他来协调解决,他经常一封接着一封地写信,给重庆工合总部写,给地区办事处写,给事务所写,给各地政府衙门写。他苦笑着承认,其中不少信件成为自己的备忘录。

只要艾黎来到宝鸡,西北工合办事处主任卢广绵就底气十足。一次,卢广绵当着艾黎的面,派人将重庆工合总会安插到西北工合办事处一位姓孙的会计绑了起来,并请来了宝鸡县县长。尽管这位会计的妻子在后面喊冤叫屈,卢广绵全然不顾,历数他私藏枪支、造假账等罪行。1939年5月,位于虢镇的吕正操将军夫人领导的办事处与国民党部队发生了冲突。这个办事处是一个流动服装合作社,有120名战士,其中一半是女兵,主要负

责给抗日部队供给服装。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国民党军队自恃人多势众,时常想吃掉八路军游击队。一天,哨兵击毙了一名擅自闯入办事处的一名军官,经核实此人是国民党预备三师的一位连长。第二天,预备三师驻西关团部突然调动一个营的兵力将办事处团团包围。事件发生后,艾黎与卢广绵紧急赶往现场,通过斡旋最终使人员获释。

艾黎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他视察工作,有时骑马,有时坐车,但更多的时候是靠着一辆自行车和那结实的双腿。他走遍了西北高原、云贵山区,走遍了全国十八个省,行程两万四千多公里。凡是“工合”涉及的地方,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1941年1月,艾黎在美国记者格兰姆·贝克的陪同下来到宝鸡,这是艾黎第四次来宝鸡考察工作。格兰姆·贝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艾黎是这样描述的:“我在宝鸡时跟着他到处视察,那简直就像跟着一台永动机。当他漫步跨过山坡时,他身上那几件旧内衣和老羊皮袄简直就把他那短小的男性体型弄成方块了。他察看一件东西时,常常是出来进去地,反复上下看个没完;他去工厂视察,有时即便相机里没有胶卷,也要给工人照相,因为工人知道自己的劳动被照了下来,是会感动和高兴的。他每天的工作是无限的,只有当夜幕降临感到非常疲倦时,他才在繁忙生活的底下,露出自己那并非万事如意的本来面目。”

艾黎虽然是一位行政职务很高的外国人,但他总是深入到中国的最基层。他说话幽默风趣,在正式讲话之前,常常先讲几个笑话,说自己因为鼻子太大和红头发陷入尴尬的困境。艾黎认为,和那些对外国人有疑虑的中国人相处时,最易于消除疑虑的办法是创造一种情景,让外国人滑稽可笑。据格兰姆·贝克所见,在西北工合办事处大礼堂召开

的一次大会上,各合作社的负责人和宝鸡的头面人物都来了,“艾黎在开场白中讲了几个小故事。可是在他开口之前听众就先笑了。从这笑声中可以听出,大多数听众听过他的讲话,而且每当他来宝鸡时,人们都想听他讲话。”

埃德加·斯诺曾说,“艾黎是让所有轮子都转动起来的‘原动力’”。在这个“原动力”的驱动下,中国工合协会在一年时间里,在全国就成立了5大区,57个事务所,1366个合作社。其中西北区成立了18个事务所,432个合作社。整个宝鸡地区成立了4个事务所,组建的合作社数目分别是:宝鸡县101个,凤翔县21个,凤县18个,陇县10个(以上数据截至1939年9月)。

工合运动不仅安置了大批的难民伤兵,稳定了民心军心,而且生产了大量的军需民用物资,支援了抗战前线。1940年,作家茅盾来到宝鸡采访。他在宝鸡待了一个月,写下了《“战

时景气”的宠儿——宝鸡》《秦岭之夜》《拉拉车》等作品。在作品中,茅盾先生描写了抗战时期宝鸡的繁荣和景气,留下了“水一样流转的通货,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的赞叹,歌颂了宝鸡工合人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

宝鸡成为中国工合运动的发祥地,艾黎逢人就讲述宝鸡工合的故事。宋美龄每次见到艾黎,一提起工合,就说“依格宝鸡”(你的宝鸡)。

2018年,金台区人民政府在原西北工合办事处、大华手工铁器合作社、工合医院和工合金库的旧址附近各立了一块石碑,将其作为金台区重点历史纪念地。碑文上虽然没有写上路易·艾黎的事迹,但人们不会忘记路易·艾黎在金台的峥嵘岁月!

(作者张占勤系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委员、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西北工合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 培黎讯息

艾黎元素作品在甘肃省教育系统 “红色基因传承行动”教育活动成果展中获奖

5月初,由甘肃省教育厅主办的全省教育系统“红色基因传承行动”主题教育成果展获奖名单公布,我校推荐的艾黎元素作品获奖。艺术设计学院选送的绘画类作品《走向黎明——致敬宋庆龄和路易·艾黎及其他们的革命朋友》获一等奖,《路易·艾黎》获三等奖;路易·艾黎研究中心选送的特色案例类作品《兰州城市学院“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艾黎精神”专题宣讲会》、《中新英三国青年“重走艾黎、何克之路”寻访活动》获优秀奖。活动旨在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持续推动红色基因传承行动,深化红色文化育人成效,把传承红色基因作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作为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载体,作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抓手,积极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育人氛围,把红色基因根植于广大师生心中,让红色成为立德树人的鲜亮底色。

据悉,本次活动经全省各地各校遴选推荐、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全省共有201件作品获奖。

把光荣镌刻在中国的伟大征程里

李 舫

2019年,新中国意气风发地迈入第70个年头。站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每一位中国人都不会也不应该忘记,70年前,从旧世界走出来的中国,是怎样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

70年来,新中国从来没有忘记与我们并肩携手的朋友们。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前夕,伊莎白·柯鲁克荣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这是为表彰一腔热忱支持中国、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的国际友人而颁发的。

这位今年已经107岁的世纪老人,1915年出生于中国成都。在成都华西坝长大的伊莎白,自小就对中国这片土地产生了深厚感情。她在加拿大接受了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后,回到中国四川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写出了人类学重要作品《兴隆场》初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伊莎白和未婚夫——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大卫·柯鲁克回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结婚。战争结束后,伊莎白和丈夫柯鲁克毅然选择返回战火纷飞的中国,在中国解放区参加了土改,并深入调查,写出又一部人类学重要著作《十里店》。她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和建设,成为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她撰写了多部中国乡村调查的学术专著,为在世界传播中国故事、促进中外友谊做出了贡献。



柯鲁克夫妇在外事学校时期

近年来,伊莎白的感人事迹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钦佩她的才华与学识,叹服于她与百年中国休戚与共的命运,更赞美她与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在杖朝之年,作家谭楷写出了35万字的纪实文学《我用一生爱中国: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重要问题。《我用一生爱中国》是一部丰富丰满丰盈的大书,谭楷在这部沉甸甸的书里,用伊莎白·柯鲁克的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伊莎白·柯鲁克如何亲历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巨变,如何见证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从创建到不断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谭楷历时三年完成这本书的写作,他通过大量采访和实地考

察,用一个个感人的小故事和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讲述了伊莎白·柯鲁克在中国成都华西坝的成长,在四川、重庆等地从事人类学研究,和丈夫大卫·柯鲁克一起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并加入英国共产党,随后回到中国解放区考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投身英语教学、促进对外友好交流等丰富的百年人生经历。



《我用一生爱中国》谭楷/著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曾说：“思想，就是推动自己和全人类的生活的力量。”是的，《我用一生爱中国》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书中时时充盈着的思想的力量。有人说，这是一部80岁的智者向107岁的智者致敬的作品。诚哉此言！谭楷说，寻觅百岁老人的足迹，是在重读中国近现代史。已经迈进80岁门槛的作家谭楷将他最新的人物传记作品定位为“故事”，讲述中国故事，这个定位符合国际传播的规律，适合主题文学的传播，显示出创作者的智慧和其对历史叙事、人物故事的把握能力。

品读谭楷笔下伊莎白的故事，仿佛在重温中国近现代史，亲切而熟悉。谭楷在书中写到一个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向全世界宣告成立时，伊莎白和她的丈夫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亲眼看见第一面五星红旗在万众欢呼声中冉冉升起。她是光荣的国际友人，又是刚刚生下幼子的母亲，观礼过程中她不得不离开一会

儿，横穿长安街，回到家中给两个月大的儿子哺乳。离开时，大卫对伊莎白说：“你要牢牢记住，我们在观礼台所站的位置，对着‘人民’两个大字——记住‘人民’，‘人民’！”“人民”两个字，被伊莎白牢牢记在心中。这段一语双关的描写，一方面写出了作为母亲的伊莎白的故事，一方面写出了作为中国老朋友的伊莎白对中国的了解和体悟。2021年，中国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目睹四川老少边穷之地天翻地覆的变化，伊莎白由衷地高兴。在书中，读者会读到两条故事线，它们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但相同的空间里时而交错，时而重叠，时而平行：一条是伊莎白在中国堪称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经历，这个加拿大女子融入、参与和创造以及试图努力改变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生；一条是作家谭楷对伊莎白百年人生的追溯和寻找、纪实和评述，他如同一个探险者，带领读者在这一个世纪的风云里穿梭、飞翔。

伊莎白·柯鲁克的一生，就像一条丝线，串起了100多年纷繁复杂的历史记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新中国建设，人类学研究、乡村改造、兴办教育……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友谊勋章”获得者，107岁的国际友人，携带着跨文化的基因，把她的激情和热血，奉献给了中国的伟大事业。



在十里店期间和解放区同志们一起吃饭

这是一部值得中国文学史记载的作品,谭楷在这部书的后记中写道:“我有一点底气,因为我是伊莎白的‘华西坝老乡’,我对她成长的环境以及她做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那条藏彝走廊比较熟悉。”其实何止如此,他一直是带着问题写伊莎白:她为什么学社会人类学?她为什么会从和平主义者,变成中国革命的支持者、参与者?在她百余年的人生中,都发生了哪些精彩的故事?为什么她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中国?带着这些问题,谭楷重走伊莎白人类学田野调查之路:走进泥巴山、贡嘎山,走进汉源彝乡、赵侯庙、杂谷脑河谷的藏羌山寨,研究《兴隆场》《十里店》,六次访问多伦多,“徘徊在静静的多伦多大学校园里,我有了书写伊莎白的信心”。开启这本书的写作计划的时候,谭楷“想想自己,毕竟是奔八十的人了”。可是,他发现,“2013年,

已经98岁的伊莎白,每天起得比鸟儿更早,还在孜孜不倦地整理她的人类学专著,与她相比,我还如此年轻”。他用一种紧迫的状态和抢救的姿态写作伊莎白,“就像发现了一片含金量极为丰富的沙滩,我想若不尽快将‘金子’淘出来,这些‘金子’很快就会被岁月之河冲走”。谭楷与时间赛跑,他说他没有哪一天是在凌晨一点前睡觉的,正是这种与时间赛跑、在新时代奋力奔跑的精神,令人感动,让人奋进。

谭楷是用伊莎白的精神写出了伊莎白,用伊莎白的智慧写活了伊莎白,用伊莎白的百岁人生写出了伟大中国的百年征程,写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初心与使命,把光荣镌刻在中国的伟大征程里。

本文首发《文艺报》2022年5月16日,作者系《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 培黎讯息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致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成立贺信

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

欣悉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已经由陕西省民政厅批准成立,首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西安培华学院隆重召开,我们谨代表路易·艾黎研究中心及工合国际西北联络处表示热烈的祝贺,对为此次里程碑式的会议成功举办付出心血和劳动的工合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今年是中国工合成立85周年。85年前,在中华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宋庆龄、路易·艾黎、斯诺夫妇等工合先驱发起波澜壮阔的工合运动。在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奋勇抗战时候,“工合之父”路易·艾黎亲自设计三角形黄底红字的工合标识遍布我国18个省份,所组织的工业合作社最多时达到3000多个,社员3万多人,援助了30多万失业者和难民,为抗战前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生产和输送了大量军需民用物资;无数工合战士用汗水乃至生命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筑起一道坚固的“经济防线”。斯诺曾满怀激情的写道:“它给成千上万中国人的中国人提供了

工作和教育,并且最后证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合作运动的先驱。”

85年来,中国工合始终秉承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初心,发扬“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坚持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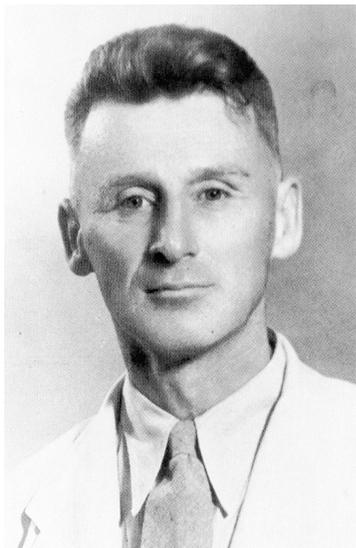
今天,“团结合作、强国富民”的“工合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脉相承;发扬光大“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更有时代意义。让我们进一步团结起来,携手奋进,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上再写华章!

预祝陕西省工业合作协会首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路易·艾黎研究中心
工合国际西北联络处
2023年4月13日

“工合”运动记述

路易·艾黎



路易·艾黎

一、抗战初期,我见到了很多中国工业遭到日本人的破坏。因为我自从一九二九年以来曾为中国进步力量尽过力,我开始考虑如何我在上海等地工业界中所取得的实践经验为抗战力量服务。许多难民涌向内地,如何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抗战中的经济力量?

二、想过所有这些以后,我去见爱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派克·斯诺(Edgar and Peg Snow)。他们刚从红军地区回来不久,鼓励我写出我的计划,我照做了。我拿给斯诺看,我们一起又作了补充。然后,斯诺又让鲍卫尔(T.B.powell)把全文印成小册子。斯诺约请各

方面的朋友组成上海促进委员会,以便为人民工业的计划开展广泛的运动。我记得胡愈之也参加了这个委员会。

三、斯诺通过一位朋友,托英国大使把“工合”计划带到临时首都武汉。那里的负责人接受了它,让斯诺通知我去武汉。我离开上海到达武汉后,感到孔祥熙的态度很冷淡,不愿意搞。但在武汉的抗日团体的影响下,他最后又同意了。“工合”全部采取使他的私人银行能进行剥削的小工业方式。在取得他的合作上毫无疑问起到了作用,因为他是行政院院长,“工合”要在各省设立,他的合作是重要的。

四、虽然如此,“工合”的领导人选还必须还是孔祥熙能接受的。所以我不得不让刘广沛任总干事。我聘请杜重远任副总干事,但是他谢绝了,去了新疆。我又聘请章乃器,他虽然应允,但不来工作。沙千里任推进处长,但后来国民党坚持辞退他。同时推进副处长胡子婴也被辞退了。

五、在武汉,我常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他总是鼓励我进行下去。博古几次来看我,帮助我制定政策。“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促使蒋介石抗战,不要让他投降。尽可能多地争取美国和其它国家对“工合”的支持,因为

国民党特别对于来自美国的任何事物都很敏感。除非是前线工作在所有非敌占区普遍开展的情况下,不要径直到延安或新四军去设办事处。但首先要在西北、西南、东南三个区设立办事处,并在其它省进行工作,那里工作开展以后,从那里可以把人和机器的援助送进解放区。

博古同志让我尽可能把武汉工业迁到西北去,因为他感到整个西北很可能成为游击区。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我不顾国民党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反对,设法使三座棉纺厂和六十座其他工厂,连同工人迁到西北。一座棉纺厂迁到宝鸡,其余两座迁到西安附近。

六、我们能够阻止国民党窃取从国外捐赠给我们的捐款的唯一办法,就是在香港设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先由普律德女士(Lda Pruitt)任干事,她去美国建立美国委员会后,由陈翰笙博士任干事。香港沦陷以后,向延安转送捐款,要经过在宝鸡的西北区办事处,由于蓝衣社、CC分子等等的活动增加,困难越来越大。后来,我们又设立了晋豫区、浙皖区等办事处,以便更好地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加强联系。但是困难一直在增加。当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时,陈翰笙经由上海银行,通过廖承志和唐明照把捐款直接转到延安,交给李富春。

七、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我第一次到了延安,见到毛主席。他已先给香港国际委员会去信要求给延安以援助,可能已经援助了一些。我向他汇报了所做的工作,他鼓励了我。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冬天,我又到了延安,又见到了毛主席,他要我特别给贺龙将军以援助。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我曾从延安去榆林,在延安边区政府“工合”事务所的一位干部李志成的帮助下,“工合”在那里设立了一个事务所。一九四〇年初,毛主席从延安派了刘鼎、陈康伯、黎雪、赵

一峰几位同志到宝鸡和双石铺,以推动西北“工合”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双石铺地区工作的开展(因当时认为那里可能成为游击队的中心)。由于这个原故,西北“工合”在双石铺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机器合作社,并设立了双石铺训练学校,这是“工合”的第一个学校,最后迁到山丹。

八、我询问贺龙将军的解放区最需要什么,听说他最缺做手榴弹的铁。于是我去洛阳,看一看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安排些款项,并把山西东南部的一个炼铁小组迁到山西西北去。

九、在东南区,我们安排让工人把机器、物资从宁波疏散到浙江西部的遂安去,靠近新四军,以便能够帮助他们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机器等等。叶挺将军对“工合”的支援曾写信表示感谢,并要求更多地供给。我两次到过那个地区。第二次去是到安徽茂林,我们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工业合作社中心。在“皖南事变”中,我们在那里的事务所首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他们用机枪攻打,打伤一个会计,然后把职员从那里押送到上饶集中营。

十、“工合”在那些年月的历史,是经常遭到反动势力压迫的历史。“工合”在江西遂川的龙会计是一位老红军,遭逮捕后,在狱中被杀害了。后来在遂川工作的主任也被捕,关在泰和监狱中。东南区“工合”的许多工作人员也陆续被捕,理由是他们有“危险”思想。在广东北部一个“工合”印刷合作社里,有一个地下共产党组织。浙皖区办事处孟主任率领合作社人员在从兰溪撤退时,与反动军队作过战,后来被捕押送到泰和。在云南大理一位六十四个合作社的组织者被捕了,以后再没听到他的消息。在陕南的汉中事务所主任,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捕,后来听说被活埋

了。在宝鸡的西北区办事处,先后有十八个“工合”妇女工作人员被捕,被送进西安集中营。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宣布,在东南区,我是不受欢迎的人。

十一、在一九四二年末,国民党解除了我在“工合”的技术顾问的职务,尽力迫使我离开中国。给我加的罪状是:我在洛阳与共产党员共同搞阴谋,利用蒋夫人的款使瑞金的八路军有所依靠,为新四军制造草鞋等等。虽然如此,我仍留在“工合”,担任国际委员会做实际工作的干事职务。

十二、我被行政院开除以后,大部分时间留在西北“工合”,把主要精力放在一个“工合”训练中心。估计在一九五〇年就要解放,为西北未来的工作做准备,计划办一个八年制的学校,收容农民、难民的子女作学生。由于国民党的迫害,我们不可能再在秦岭的双石铺工作下去了,所以就另找了一个地方——甘肃山丹。当时甘肃建设厅厅长张心一正在那里,欢迎我到那里工作。在离开双石铺以前,我托“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赵叔义给周恩来同志带了口信,说倘若认为需要,我们都能去延安,但在那里得不到机器和款项,如果我们去山丹,就能得到这些。如果几个月内他没回信,我们将按计划去山丹。后来没有得到回信,我们就向甘肃西部进军了。

十三、在山丹,我们设立了一个训练中心,自力更生地工作,尽力争取一切国际支持,收集卡车和机器,总共成立了二十八个实验训练分队。青海的马将军决定在这所学校还没开

学之前就把它摧毁,但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解放时,我们为解放军运输,帮助了达马营新马补充站和玉门油田的解放。四十年代后期,美国的支援停止了,新西兰继续帮助我们,直到一九五〇年学校由油田管理局接办。一九五三年末,学校迁到兰州,改名“石油技术学校”,直到一九六六年,我一直担任这个学校的名誉校长。一九五〇年,我来到北京,与周总理会见,他让我仍回山丹工作。一九五一年,他派黎雪同志帮助我解决一些问题。黎雪曾任延安“工合”主任,在这里他帮助康世恩同志工作。

十四、一九五二年“工合”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并,所有国际委员会的活动即告结束。

十五、自然,在进行“工合”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工作中,特别是在战时寻找职业困难的情况下,参加进来的有各阶层人物,但是具有好的政治动力推进我们工作到底的那些人总是坚强的核心,特别是在西北山丹。在“工合”后期,国外捐款分为三份。三分之一作“工合”行政费,三分之一供新四军,三分之一给山丹学校。在整个的历史过程中,“工合”一直得到宋庆龄先生的鼓励和帮助。八路军办事处的王炳南同志也一直鼓励和帮助我们。

(一九七六年十月)

(来源: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1辑,第102页-107页)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友乔治·艾温·何克

任立之

编者按：任立之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40年在从事工合工作时与乔治·何克结识并成为亲密战友，现特刊出她2005年写的一篇回忆录《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友乔治·艾温·何克》，以纪念何克逝世78周年。



图为任立之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思绪万千，深深怀念着一位国际友人——乔治·艾温·何克。他是一位英国青年，通过他姑姑史沫特来的介绍，成为路易·艾黎的秘书。何克是我一起在工业合作协会的战友，今年正值90岁诞辰，可是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60年了。他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我家的照相本中，最精致的那本第一页就放着何克的5寸黑白照片。我们全家都知道这位英国青年是我最尊敬的国际主义战友。

“看到了一个新中国”

1940年初，我在宝鸡工合西北妇女部工

作。有一天，他来了，身穿中式棉袄棉裤，胸前挂着一个照相机，个子高大英俊，两眼炯炯有神，高高的鼻梁，微笑中带有坚韧。他说他名叫乔治·艾温·何克，是一名记者，到这里来是想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动员国外慈善机构及进步人士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我们大家立即表示热烈欢迎，他笑了。何克为人坦诚、热情，好亲近，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我们在一起工作，一起唱抗日救亡歌曲，他还跟着我们学中文，谈时事，大家成了好朋友。

何克1915年出生在英国的中产阶级家庭。1937年他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在美国的一家杂志社当记者。1938年，随其姑母环球旅行来到中国。在中国他亲眼看到了日寇烧杀抢掠，蹂躏中国老百姓的野蛮暴行，十分同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毅然告别姑母，决定留在中国。他曾经冒着危险，前往八路军所在地晋察冀前线采访，看到老百姓与八路军同仇敌忾并肩作战，老乡们不仅给八路军送水送粮，还送走丈夫和儿子参军杀敌，七八岁的孩子们也组织起来在村头巷尾站岗放哨，保家卫国。看到中国人民奋起抗敌，何克感到十分振奋。聂荣臻司令员和朱总司令曾先后亲切地会见了，并

鼓励他与艾黎合作,因此,他来到了宝鸡。

在宝鸡,他和我们一起积极加工合工作。那时从武汉逃出来的难民纷纷涌到陇海铁路的终点——宝鸡。工合很快收留了难民们,并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合作社,生产自救,有的做鞋,有的缝衣,有的在铁工厂制造简单的武器弹药和零件,还有的纺羊毛,织军毯,支援前线作战。这些有益的工作,对克服日本鬼子的破坏和国民党的封锁,对坚持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们妇女工作部还开办了许多学校,解决了难民孩子们上学的问题。这期间,何克拍了很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八路军抗战以及日本鬼子残暴罪行的照片,寄到外国进行宣传,并从国外募捐了大量钱和药品,支援前方将士,给抗日战争带来很大帮助。

后来,何克在波士顿出版了《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一书。书中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民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

一个充满爱心的人

何克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高尚的英国青年。

当时,日本鬼子的飞机经常到处轰炸,敌机飞走后大家都跑到现场去抢救受伤人员。有一次,何克和我们一起去寻找伤员时,发现我们的一位战友被炸死了。她是一位教师,从学校回家的路上被炸死的。何克见到她的遗体后,迅速脱下自己的外衣,把女教师包好,抱起她快步走向安全地带,并立即拿起铁锹有力地一锹一锹挖坑,带着悲愤和仇恨,亲手埋葬了这位女教师。我们伤心地在女教师墓前默默致哀。何克的感情完全倾注在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他跟随共产党抗日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中国共产党是有前途的,他会永远留在中国,直到和中国人民一起把伟大的抗日战争事业进行到底。

有一次,何克外出采访。那时条件很艰苦,没有交通工具,日夜兼程,十分疲劳。正巧遇上一个推着独轮车的农民,就跟他商量,“能不能坐你的车,我付给你钱?”老乡满口答应,何克高兴地坐了上去。过了一会儿,发现推车人气喘吁吁汗流浹背,俺不忍心了,赶紧让推车人停下来,对他说:“我现在不累了,咱俩换换吧,你坐车,我来推你。”回来后,何克把一路上的情况告诉我们,大家听了十分钦佩和高兴。

“四个孤儿”的再生父母

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故事:何克是一个未婚的英国青年,但是却在中国当上了“四个孤儿”的养父。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战友聂长林是地下党员,因为暴露了身份,组织上调他去东北前线工作,家里留下了四个孩子和生病的妻子。而我已下定决心,很快就要去前方参加八路军。谁来照顾这几个孩子呢?我跟何克反复商量:聂长林走后不可能很快就回来,孩子的母亲又有病,自顾不暇,根本不能照顾孩子们。怎么办呢?我知道何克是一个可靠的热心人,就试探着问他:“你能不能给他们一家子帮帮忙?”何克的心情沉重起来,他说:“带孩子这样的事我可从来没做过呀。”“那孩子们怎么办呢?”犹豫再三,他说:“没有别的办法,还是我来管吧。”就这样,何克接下了这个沉重的“包袱”。

那时何克在学校工作很忙,接下这个任务后他把十来岁的老大、老二送到培黎工艺学校读书,要把他俩和学校里100多个学生都培养成既学知识又能制造武器、纺纱织布的劳动者。最困难的是只有3岁和不到2岁的纺纱小孩子,吃喝拉撒睡都要管起来。不久,孩子们的母亲病故了,何克就承担起四个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全部责任。

何克在中国孩子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对他们百般疼爱,成了孩子们真正的“父亲”。战时长

期超负荷工作又加上缺乏营养,已使何克心力交瘁。孩子们逐渐长大成人但何克却越来越瘦了。

1945年7月22日,何克不幸因患破伤风去世。

后来培养孩子的重担又由艾黎继续挑了起来。现在这四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其中三人在北京和东北的研究院工作,一个在外支援兄弟国家。他们都已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如今,每提起往事他们都唏嘘不已,永远不会忘记何克对兄弟四人的养育之恩。

建立“何克图书馆”

1985年7月22日,这是何克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甘肃省对外友协为了纪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在艾黎和他100多位学生的支持下,在山丹开办了“何克图书馆”。那一年我去了山丹,“艾老”来了,马海德也来了。何克的战友、学生来了100多位。他们都对我很亲热,就像相识多年的老朋友。大家深深怀念何克,回想起何克老师在困难的日子里对学生们的教育、帮助,关怀备至,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学生们告诉我,当初何克的中国话讲得不好,后来却成了中国通。有空时,何克还教学生们唱许多抗日救亡歌曲,虽然大家的生活很艰苦,但是心情很愉快。

学生们还告诉我,当时何克患了破伤风,因为缺少医药最后不幸去世了。我听后心中非常难受。

何克,我的良师益友!你不远万里而来,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牺牲了自己。我不会忘记和你在一起的日子,不会忘记你的音容笑貌,不会忘记你的呵护和帮助。你热爱中国人民,你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

何克殉职时是甘肃山丹县培黎学校教导主任,他去世后校长艾黎亲自给他立了碑。20

世纪80年代初,何克陵园修葺一新。1988年艾黎逝世后,也安葬于此。陵园改称为“艾黎与何克陵园”,邓小平题字“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楚图南书名,邓小平题写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永垂不朽”镶嵌在黑色大理石照壁上。中轴线前方竖一综合碑,长7米,高1.8米,大理石贴面,右侧镌刻着艾黎生平,左侧镌刻着何克生平。两位逝者的墓一南一北并置于一19*18米的对称多角的五级台阶的平台上,两墓之后为纪念碑,形似两手微屈相合呈梭形状,下面有一长方形基石,其正面下部做一圆龛,里凹,置省政府竖碑,碑文是“国际主义精神放光芒”。这些年山丹县青年学生、驻军每年都来瞻仰。

在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陵墓前,有许多人前来献花,前来真诚地表达自己无限的敬意!我在作者赵毅写的《国际友人的足迹》一文中,看到这样一个动人的描写:女医生把一株叫不上名字的花种在墓旁,用双手给花根雍上湿漉漉的泥土,又用脚踏实。我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花?”“九月菊,九月开花有根治百病、起死回生之功效,又名叫万寿菊。何克患破伤风时,这里没有九月菊,如果有它,可以治何克的病。”这种真诚地献花的感情,让我深深感动。

甘肃省剧作家姚运焕同志带来了反映何克、艾黎为主角的电影文学剧本《塞草青青》,何克的外甥特地从英国赶来,扮演了“何克”。《塞草青青》这部电影曾多次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在群众中引起好评。

2015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已高龄89岁了,难以远程去山丹。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帮助过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我们将把国际主义精神不断地发扬光大!

安息吧,我尊敬的国际主义战友何克!

(本文来源自上海科技党建网2016.6.20,徐红整理,徐红系原上海市科协老干办负责人)

乔治·何克的中国情怀

双 蝶

抗战初期的一次到中国的偶然游历,让他与这个东方古国从此结缘。中国八年抗战,他先后以不同的身份成为最直接的参与者。他将自己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中国西北那个叫山丹河的岸边,也将自己的故事永远留在了中国人民的心里。



乔治·何克

甘肃,山丹。

城南外边的山丹河北岸,一座绿树掩映的陵园常常会引起外来者的好奇,因为长眠在这里的是两个外国人:路易·艾黎和乔治·何克。

路易·艾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名字在中国也是广为人知。相比之下,人们对乔治·何克却感到很陌生。2008年,由中国、澳

大利亚、德国联合拍摄的抗战题材电影《黄石的孩子》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一个外国青年带领60个中国孩子所经历的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其中外国青年的原型就是乔治·何克。

乔治·何克为什么来中国?为什么会带着中国的孩子逃亡,为什么又会长眠在甘肃山丹呢?

坚守中国战区的记者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时,22岁的英国青年乔治·埃文·何克刚刚从牛津大学瓦德汉学院毕业,成为一名文学学士。何克的姑姑穆里尔·莱斯特是一位交友广阔的国际和平主义者,当时正在为周游世界做准备,于是,何克决定跟着姑姑一起走。

1938年2月,何克和姑姑乘坐的法国杜默尔总统号轮船从日本抵达上海。他们原计划在中国停留两周,然后去印度。但是,何克被眼前看到的景象震惊了。

上海—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城市,正在遭受侵略者最残酷的摧残和蹂躏,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到处是日本士兵在烧杀劫掠,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人们在大街上忍受着饥饿、寒冷、疾病和死亡。何克住在姑姑的教会朋友那里,他尽一切可能地帮助着这些可怜的人们。两周后,当姑姑按计划要前往印度时,

何克却改变了主意。他对姑姑说，“对不起，姑姑，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

何克决定留在中国工作，姑姑便将他介绍给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担任其在中国的通讯员。不久，何克被著名的美国合众国际新闻社聘为兼职记者，与合众社驻汉口的全职记者杰克·贝尔登一起工作，并开始学习中文。

何克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到处奔波，将他在中国观察到的一切，尤其是战争带给普通老百姓的伤害与疾苦，写成一篇篇报道发出去。

1938年10月，在汉口沦陷前，大多数媒体记者都跟国民政府一起迁往重庆，何克却挤在混乱惊慌的逃亡人群中一路到达西安，将沿途的景象真实生动地描述在长篇报道《最后的火车》里。之后，他又冒险返回汉口，成为外国记者中坚守在战区的18名“最后的挖掘者”之一。

其实，何克刚到汉口不久，就曾在史沫特莱的安排下去过一趟延安，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星期。虽然时间不算长，但延安的一切却给这个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回来后写给母亲的家信中，他说“这里的一切都是传道。这里的8千多名学生靠小米粥和传道过活……”

从延安回到汉口不久，史沫特莱又将何克引荐给自己的老朋友、正在汉口筹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路易·艾黎。艾黎很喜欢这个英俊、坚韧的英国青年，希望他能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做事，并推荐他去设在陕西宝鸡的工合西北总部，找办事处主任卢广绵报到。艾黎同时告诉他，在那里工作没有薪俸。

1939年三、四月间，春寒料峭，何克在去往西北的途中，病倒在一个乡村小客栈里，被途经此地的凯瑟琳·霍尔发现。霍尔经常往返穿行于日军封锁线之间，以教会医院的名义秘密从北平为在晋察冀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工作的白求恩医疗队采购和输送前线紧缺的药品、

医疗器械和医护人员。她将这个患斑疹伤寒已陷入半昏迷状态的青年驮到骡背上，带到自己位于河北曲阳县宋家庄的诊所进行救治和护理。

经过霍尔的悉心治疗，何克恢复了健康，并和霍尔成为好朋友，也知道自己已经来到了聂荣臻将军创建的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

有一天，聂荣臻将军派人将何克接到了唐县和家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这里，何克受到很高规格的待遇，看到了龙华大捷刚刚缴获的日军重要文件，和聂将军朝夕相处一星期，讨论中国抗日斗争的前景，探讨工业合作运动，受到很多启发。之后，他带着聂将军派给他的一名翻译兼向导、4名警卫员和6匹马，走访考察了整个根据地，被那些在缺吃少穿环境中依然顽强作战的普通将士与老百姓深深感动。

从这时起，何克开始写一部叫《黄河观察》的书，讲述他在晋察冀根据地以及之后在工合工作中的见闻。这部书1944年由美国小布朗公司出版时，改名为《我见到了一个新中国》。次年，此书又在英国出版。《纽约时报》评论员马克在提到该书时说，“何克对他所讲述的每一个人都充满了热情与敬意。”

为工合运动四处奔波

1939年秋天，何克到达宝鸡，投身到工合运动中。

他每天都马不停蹄地奔走各处，去兰州、洛阳、西安、汉中等地建立办事处，到所有乡村和难民集中的小城镇去建立一个小型合作社，帮助那些快要饿死的社员们写商业计划书，争取设备、贷款和原材料的投入，检查生产情况和资金落实情况，给总部撰写各地合作社发展状况的报告，写英文宣传材料，等等。

艾黎曾说，何克和他肩负着同样的重担，进行着共同的战斗，他走到哪里，何克的信就跟到哪里。

何克的工作费用本来可以实报实销,但他舍不得花工合的钱,大多时候都是和那些如潮的难民们一起去挤大卡车,有时骑马、骑骡子、坐驴车,或徒步行走,随身带着一条包在油布里打满补丁的棉被和军用毯。他把在路上的见闻写成了一篇“从汽车看中国”的文章,发在《新政治家》上。

在整个西北地区,哪里有合作社,哪里就有何克的身影。他还多次去重庆,联系媒体圈的朋友为工合做宣传。美国《时代》杂志对他写的那些合作社故事感兴趣,他就一直给这家杂志供稿。

1941年,何克被重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部任命为检察官,获得一张由孔祥熙亲自签名的通行证,这为他的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1942年3月,他又被总部聘任为双石铺培黎合作技术培训学校的校长,由此开始了他更艰巨也更神圣的使命。

当时各地合作社最缺的是资金、设备和技术人才,艾黎因此计划在工业合作协会下面建几所技术培训学校,收留战争孤儿和难民子弟,为工合运动培养技术力量。学校以他所尊敬的导师和朋友——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科学家约瑟夫·培黎的名字命名。

1940年前后,第一所培黎学校在宝鸡凤县双石铺镇完成初建。在何克到来之前,总部已先后聘任过7任校长,但他们或因条件艰苦离职,或因故被解聘。何克作为第八任校长,担负着艾黎对这所濒临倒闭的学校寄予的最后希望。

在此之前,何克曾多次来双石铺视察和帮助合作社工作,也一度参与过学校的重建。上任时,他发现镇上汇聚的难民比他第一次来时增加了两倍多,而且仍在不断涌入,到处是愁惨混乱的荒凉景象。学校里更是一派萧索狼藉,教职工和大多学生都已离去,只剩下十几

个破衣烂衫、无处可去的孩子。

何克先从合作社商店中给学校厨房买来吃的,然后从合作社找来一些工人帮忙修葺校舍,安顿好孩子们的吃住。然后,他带领工人开始修围墙、菜园、篮球场,将三间教室的一间改造成车间,在院子里又盖了另一间车间,还在学校旁边的山崖上挖了两孔土窑洞,一孔做校长卧室兼办公室,一孔用来接待宾客。

与此同时,他一边想办法跟这些孩子们沟通,听他们倾诉,一边帮他们修补膝盖的破洞,擦洗肮脏的后背,甚至将孩子们送到西安检测眼睛,治疗疥疮、疟疾等疾病。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6到16岁的孩子们和周围的难民们一样,每个人都有一段长长的心酸和悲愤的故事,何克要让学校成为这些孩子们的家。后来,他又将地下党员聂长林的4个孩子聂广淳、聂光涵、聂广涛,聂光沛收为养子。

何克到培黎学校两三个月后,学校就变了大模样,走了的老师和孩子又返回来,人数上升到35名,到秋天又增加到60多名。

“小长征”实现“大迁徙”

学校走上正轨后,何克规定学生们必须每天花5个小时的时间在教室做功课,花3个半小时在学校车间或是附近的合作组织参加实习。另外,学校针对年龄小和教育程度低的孩子开设了中文课,针对教育程度较好的孩子开设了会计学、经济学以及高级地理课。作为车间课程的准备,学校开设了机械课。所有孩子都学习时事新闻,接受卫生和急救教育。同时,学校还给周围青年难民办培训班,让他们成为合格的工人。

何克除了学校管理,还代英语、经济学和地理三门课,据说学生们跟他学的第一句英语是唱出来的。他自己每天早晨5点起床,规定学生6点起床,到河里去洗脸、游泳、做早操。

几年的时间,何克渐渐成为艾黎最得力的

助手和伙伴,他将双石铺培黎学校打理成一个难民根据地,同时又去兰州、洛阳、成都等地帮艾黎筹建其他培黎学校。

1943年到1944年,学校下面由学生和难民创建的几间合作工厂开始盈利,何克高兴地给妈妈写信说,“我们干成功了。我们没有技术员,孩子们和难民们一起自己干成功了一我们治好了河,也使机器运转起来了。”

然而,就在这时,西安和宝鸡不断遭受敌机轰炸,局势越来越吃紧。艾黎决定秘密迁校,将新校址选在西北荒漠地带远离战区的山丹县。他先去打前站,与当地政府交涉,找校址,让何克随后带领孩子们前往。

双石铺离兰州700公里,兰州离山丹466公里,这么大一所学校,1000多公里的大迁徙,还要秘密进行,怎么可能呢?但何克却做到了。

在1944年后半年的几封家信中,何克详细讲述了这次“小长征”的过程。他说,“路易来信告诉我们如何装运苹果树、山羊、那位逃难来的牧羊人兼保姆以及那些小宝宝们(5-7岁的孩子)。可钱打哪儿来呢?这可把我难住了。不算别的,单是一辆卡车从兰州到双石铺就得花八万七千元,一辆手推车得花七千元……”

何克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交通工具问题,他让学生把学校的旧轮胎、轴承、钢管等东西集中起来送到机器合作社,请工人师傅帮忙制造大车,又派几个北边县里的孩子去当地农民那里弄一些马、骡子和手推车。11月底,第一批33个孩子和大半教师带着部分设备,乘坐两辆卡车离校,他们跟镇上的人说是出去进行一项长途地质考察。圣诞节那天,他们到达山丹。

1945年1月20日黎明前,何克带着装得满满的5辆骡子大车、一辆卡车,带领30个男孩和3个教工离开了学校,向山里进发。最小的孩子坐在卡车上,盖在盖设备的油布下面,老师和大孩子轮流坐板车或步行。

何克在家信中说,“我们5天内翻山越岭走了57公里,翻了两辆大车。这是气候最恶劣的季节,我们走在高山上,顶着20年来未遇的寒风,路上覆盖着冰雪。”途经天水时,为了御寒,何克在当地的纺织合作社给每个孩子买了一副毛绑腿。

经过一个多月饥寒交迫的长途跋涉,他们到了兰州城。艾黎安排接应,通过一个叫张义的地方官员,低价租到6辆老式“奔驰”柴油发动机卡车和一辆“道奇”汽油发动机卡车。何克在信里描述说,“这些年迈的宝贝启动器不起作用,每天早晨都要由那辆年轻的‘道奇’一辆一辆拖着发动。”

3月10日这一天,他们终于抵达“希望之乡”——山丹。

“我的一切都留给学校”

何克到山丹后,艾黎就放心地离开,去做许多迫在眉睫的外围工作,包括找钱、打通关节、和重庆方面工合高层交涉、争取官方承认等等。

其实,山丹等待何克和孩子们的新学校,只是一座叫发塔寺的旧庙。因为废弃已久,里面破破烂烂,除了大大小小的佛像,什么都没有,而且因为住过马步芳的骑兵队,连门窗都被拆下来当柴火烧了。但不管怎么样,师生们总算有一个容身之处。

何克一向乐观,他顾不得因长途跋涉瘦了一圈的身体,立即带着孩子们开始清理垃圾,准备像重建双石铺学校时一样大干一场。

他在镇上买了三座老房子,拆下砖瓦和木材,用手推车运到庙里,开始建造新校舍。他说,“我们仍在忙着建各个车间,院子的一边都是车间——木工、蒸汽机、发电机、车床、刨床、磨床、钳工和毛纺,院子中间最大的庙堂放我们的高斯棉纺机。另一边是教室,后边是宿舍……”锅炉、蒸汽机和发电机是学校的命根子,

他们打算除了自用,还向全城发电以得到免费的煤。

整整3个月时间,何克每天带着师生们起早贪黑地干活,几乎没有时间写作,但他认为实干比写作重要。到了五、六月,学校基本成形。虽然因为缺东少西,师生们被迫省吃俭用,但所有人都很开心快乐。

然而,就在何克历经艰辛,在荒漠戈壁为学校点燃希望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945年7月中旬的一天,何克和孩子们一起打篮球时,穿露趾麻凉鞋的脚在石头上绊了一下,脚趾受了伤。对此,他根本不在意,其他人也没有在意。但几天后,他开始感觉不适,脚趾又痛又肿,下颚也开始疼痛,还变得僵硬。当地医生诊断说是流感,于是就当感冒开始治。

艾黎带孩子们去山里的那天早晨,何克还说,“去吧,你们回来时我就会好些的。”但艾黎刚走不久,他就发作了第一次抽搐,当时在他身边的布莱恩·哈兰德赶紧派学生把艾黎叫了回来。这时,大家才意识到,何克得的可能是破伤风。艾黎立即拿出学校全部应急资金,派老师和学生雇车去武威和兰州找大夫,找血清,他则守护在何克身边,焦虑不安地等大夫来。

7月22日早晨,何克跟艾黎要来纸和笔,在上面写了“我的一切都留给学校”几个字。他艰难地说:“我知道我会熬过去的,但总要有做好准备……我只有几件衣服和一个相机,你可以把它卖了作为学校的经费。”

下午两点左右,何克在一阵窒息后,停止了呼吸。守在门外的孩子不相信校长真的走了,他们冲进来,用他教他们抢救溺水者的办法抢救他。

去兰州的孩子终于找到有血清的大夫,可他们整整迟了一天才赶回学校,出殡的队伍正在缓缓走过街道。

年仅30岁的何克就这样突然离开,被安葬在了山丹河北岸。

20年后,何克的母亲凯瑟琳将自己保存的儿子的全部信件交给艾黎,希望他能为儿子写一本书。自从何克去世,艾黎一直自责自己为什么没有想到旧屋子的泥土地会感染细菌,为什么没有预备血清疫苗,为什么没有早发现……他一直不知道要怎样安慰远方那位一直等着儿子回家的母亲。所以,对凯瑟琳的心愿,艾黎欣然答应帮她实现。这就是艾黎后来写成的《Fruition》(终成正果),中文译名叫《从牛津到山丹—乔治·何克的故事》。

何克去世后,路易·艾黎亲自担任山丹培黎学校校长。1953年,学校迁到兰州,艾黎移居北京。1987年12月,艾黎去世。他留下遗愿,将骨灰洒在山丹,墓碑立在何克墓碑的旁边。何克陵园由此改为“艾黎与何克陵园”。

在何克的墓碑上,刻着他名字的缩写字母“GAH”,还有一首他喜欢的英国诗人格伦费尔的诗:“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他已逝去,从此不再奋战/在战斗中逝者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2008年,一部以何克为原型的电影《黄石的孩子》,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位英国青年献身中国职业教育的感人故事。

(本文采写过程中得到甘肃省山丹县委宣传部和著名摄影家沙飞女儿王雁女士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本文来源自新西部网2013.6.6,作者双蝶系《新西部》杂志记者)

THE BAILLI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SCHOOL

Some two years ago, th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started a pioneer school-cum-technical college for peasant and worker-sons in the rather isolated but very beautiful mountain village of Shuangshihpu (雙石鋪). Its purpose is to train the boys — picked for character and intelligence more than academic ability — to be good co-op. members. The idea is to get them young, and from tough backgrounds, so that they will learn to look on the O.I.C. as their home. Ordinary school qualifications counts for nothing. The result is we've got an interesting and characterful bunch of lads. One of them lost his mother on a crowded ferry while evacuating Shanghai, and never found her or his family again. Some are refugees from the province of Henan, which is so overcrowded that most of the poor families have to send one or two of their sons away from home to fend for themselves. Four or five of them are refugees from Manchuria since the Mukden Incident of 1931. The rest are native peasant boys. They learn to talk each other's dialect; big ones, small ones, middle school graduates and near-illiterates, all mixed up, and all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and I from), we are having a lot of fun, producing some otherwise unproduceable boys. They are a bit wary of their foreign Dean; and whenever I do anything they can't understand, it is scathingly dubbed "ocean" (foreign

principle). However, we get along quite well. Most of them are just at the age when Chinese lads are most apt to become nationalistic.

We had a few stormy sessions about Opium Wars, Foreign Concessions and such like, but it all calmed down when they realised that, in spite of the height of the respective bridges of our noses, we really saw more or less eye to eye on these subjects! The main trouble now comes from their own past environment, and from the fact that their previous teachers, of whom there have been seven deans, (or headmasters) within the school's total history of two years have not understood the real purpose of the school, and what kind of boy it is meant to turn out. It is difficult to get men with any social vision around here, for various reasons. Therefore, it is different to get anyone to run a new kind of school even on a small scale like ours.

The students learn all kinds of things: Chinese and arithmetic for the younger and the less educated (some were illiterate when they came); accountancy for the more educated; co-oper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textiles, news of the week, motor mechanics and mechanical drawing, health and first aid, diary and composition for everyone. There are five hours' classwork each day, plus three-and-a-half hours' practical works in our own workshop or in various co-ops in the

neighborhood. The boys also run their own consumers' co-op, at which they spend their small allowances for towels, soap, toothbrushes, straw sandals, pencils, writing-brushes, etc. Every week we have a self-criticism meeting, as well as school debates, etc. Thus the students are trained in the working of democracy through all their activities. I don't teach much myself — some English, economic geography and co-operation — but there is plenty to do putting the school on its feet and organizing things in general, as well as giving pep-talks to boys and trying to mould a school tradition on which to build for the future.

After graduation, the boys are supposed to go into the Co-ops, as “middle-men”, between for example the western-trained engineers and the co-op members. As it is, the former often have great difficulty in getting their ideas over to the latter. Language is often different, thought processes always so. The boys from our school will know enough of both worlds to act as go-betweens. They will interpret the engineer's ideas for broad technical improvement to the co-op work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will bring their first-hand knowledge of co-op, conditions, native people's difficulties and attitudes to the C.I. C. specialist.

Our students all used to take a short cut across a farmer's field, which made the farmer very angry. Then other people got the habit, so that, when I stopped the boys going over it, it was still just as bad for the farmer. Today I called together the week's gang, composed of any quarrelsome, disobedient, time-wasting, otherwise guilty boys, and got them to dig up the whole path and erect a wall at other side. The farmer is

tremendously impressed, and the boys who sweated to dig up the path will make sure that non-one else, goes over it!

The school is forging ahead. We are now building new additions and shall soon have a really efficient workshop of our own for the boys to learn in, complete with lathe and all essential requirement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here that nobody would ever think of in England; tools are almost non-existent, and the idea that every boy should have a lot of carpentry or other tools of his own would be unthinkable. Materials are booming more and more scarce. One of the masters taught the boys how to make their own arbucus out of a few bits of old wood, some bamboo and digits made by rolling up little wheels of mud and putting them in the sun to dry. Toothpaste is prohibitive so we are using salt. Clothes we are making entirely ourselves, black canvas outside, padded with cotton; one short belted coat per boy and a pair of padded riding breeches. When we get our woolen set running (and we are just buying land for that purpose down by the river where we can get water-power) we shall be able to knit woolen sweaters, too.

We have learned a lot about what kind of boys to take, and how to get them to live productively and creatively together. The majority, at least, must be working-class, a mixture of stolid peasant natives and quicker city lads. We can't risk more than a ten per cent ingredient of student-class boys, however hard the post-war circumstances of these may be, because they have old bad habits — “long-mailed” attitude towards working with their hands, and a sneaking admiration for the non-productive bureaucrat of-

ficial who can sit in an office chair and hinder other people! But there should be this small ingredient, as the worker-boys learn a lot from them. Some of them are more socially conscious, too, and act as good leaders. We've got one now who was an absolute pest of haughty, unco-operative ways for the first month, and then made a complete switch-over into being easily the best boy in the school. Now, I'm going to send him up to help found our new school in Lanchow (蘭州), where I hope to go myself in a few weeks. I shall then go east along the line to Loyang (洛陽), where our third school is starting, maybe next year to Chengtu (成都) in Szechwan (四川) where they are hoping to start a fourth very soon. Within a couple of years we shall have a stream of new blood flowing into the co-ops, bringing new life into them from the workers.

The original idea was to send the students straight out to the co-ops directly they graduate, but I have another plan in mind. These boys might not be strong enough to bear having their entire environment changed, and suddenly becoming co-op. leaders and advisers. They might, instead, be changed by their environment, thereby wasting all the non-technical part of their training in the school. So we are going to set up a sort of buffer-state of co-ops, and machine shops, experimental textile plants, transportation routes, etc., run by the school, into which students will be sent after graduation. They will stay in this semi-protected area for a year or so to improve technique and co-op knowledge before going out into the big, bad world.

My particular home-front to produce workers who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working for

and work hard because they are interested and want to, is growing apace. People are calling out for other Bailie Schools (培黎學校) in all part of the country, stipulating that they must be like the Shuangshipu one!

You may think that we are forgetting about wars and such like world events,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we have then brought home to us in many ways day by day. Modern wars are won less by weapons than by morale, organization, and general attitude to life. So I feel that my job here is well worth doing in the win-the-war as well as the build-for-democracy sense.

END.

George Aylwin Hogg

培黎中国工合学校

乔治·何克(秦泉安译)

大约两年以前,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中国工合)开始建立了一个开创性的学校——技术的学校。旨在为这些这所相当偏远但却非常美丽的山区小镇的农民子弟和在此工作的合作社工人的孩子提供培训的学校,而这个学校的目的就是去培训这些孩子们,教授他们以技能。这些孩子的选择不是一起学分和学业考试成绩来选择录取的,而是更看好他们的个人品德和智力,因为这些被选的孩子将来要成为合作社的社员或领导。设立此校的出发点是,从小就接手这些孩子们,而且其家庭背景和出生困难,这样他们就只能依靠工合,并会把工合作为自己可依靠的家。在这里,普通的学校拿着入学资质的要求一文不值。其结果就是,我们很快就招募到一大批对此颇感兴趣且有特色的孩子入学。其中有一个孩子是在与家人从上海逃难时在拥挤的渡船上跟他妈妈走散的迷途孤儿,从那儿以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其家人。也有一些

是来自湖南(Hunan,但可能应该是河南)的难民小孩,因为河南哪里人口太多,很多贫穷家庭为了生计不得不把自家中的一个或几个打发出去,好让他们自己去谋生路。其中还有四、五个孩子是来自东北的难童,因为那里曾发生过1931年奉天惨案(满文音译为谋克敦)。大部分都是本地(含宝鸡)的农民的孩子。小孩之间互相交谈,使用各自的方言,还在年龄、大小各有不同,或大或小,有些可能快中学毕业了,有些还近乎文盲,一个大字不识。但在这里都要混班上课,大家同时也互相学习,我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大家在一起,非常的快乐,从而培养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好学生。他们一开始有些躲避他们的这个外国校长。一旦我做什么事或让他们做什么事,而他们并不理解时,他们就会不情愿地嘟囔说“洋人”(外国校长)。事实上,我们相处还蛮好的。他们大部分的年龄也刚到开始懂事,开始懂得民族意识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处于中国男孩充满时期民族主义的年龄)。

除过对于诸如鸦片战争、外国租界及其他一些类似问题,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和难以沟通外,一旦我们静下心来,大家就会意识到,尽管我们大家的鼻梁高低有所不同(外国人大鼻子),但在这些议题上的总统看法相去不远。而真正出现的大问题则更多的来自他们每个人的经历和环境,以及他们可能曾经有过的给他们教课的老师,因为前期他们仅在这里短短不足两年时间里就已经经历过七个不同的主任(校长)了,而这些老师或校长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这样一所学校的办学目的和宗旨,甚至也不理解这样的学生们将来毕业能够去做什么。(因为各种原因,很难在这里周围找到具有这样的社会视野的人来此任职。因此也很难找到任何人来管理和运作像我们现在这样小规模的一所类似的学校)。

学生在这所学校来学习各种各样的东西

年龄小和受教育程度低(有些学生来学校时是文盲)的人学习语文和算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学习会计学;但每个学生都要学习合作社、经济地理、纺织、一周的新闻、电机力学(运动机械)和机械制图、健康

和急救、学习记写日记和作文。他们每天上五小时的课,再加上在自己的车间和附近各种合作社去从事三个半小时的实践活动。

那些学生们还要去学习经营他们自己的消费合作社,在那里,用他们微薄的津贴来购买日常需要的毛巾、肥皂、牙刷、草鞋、铅笔和毛笔等等。每周我们都有自我教育批评会,以及学校辩论会等。

因此,在所有的活动过程中,都让学生接受一种民主精神和践行的培训。

我本身没有承担太多的教学,仅仅教授一点英语、经济地理和合作方面的东西,但是通常要去组织很多事情,让学校恢复并运转,依然有大量的事去做。同时,还给学生召集鼓劲动员会,并且尝试

去建立一种学校所应有的传统,有利于学校未来建设。

毕业后,期望这些学生们都进入了合作社工作,并作为合作社的“中间力量”,即在受过西方训练的工程师与合作成员之间作为协调的阶层。因为现在的情况多是,前者经常在把自己的设想和注意表述给后者并期望被理解时会遇到较大的困难。通常语言有不同,思维过程亦如此。通过我们的培训,学校的毕业生(学生们)讲有能力充分了解了这两个不同世界的差异,并做好两方面的协调沟通。他们将会把工程师的想法理念解释给合作社里的个人们,使得他们在工作中得到广泛的技术提升。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把他们在合作社运作、条件、本地个人的困难和态度等的第一手资料 and 知识传达给中国工合的(国际)专家。

我们的学生都经常在田野上抄小道,从当地农民的地里踩过,这使农民叔叔感到极其懊恼。慢慢的其他人也养成了抄小道的习惯,以至于当我出面阻止学生们横穿田野的时候,它仍然对农民叔叔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今天,那些平常喜欢吵架的,调皮捣蛋的,浪费时间的和在其他方面不遵守法纪的男孩们被我叫在一起,在田野中间踩出来的小路挖断,并在斜路的另一头修了隔断围墙。那个农民非常的感动,而这些参与辛苦劳动,出力流汗挖路筑墙的学生们也将确保没人

再会在田野上抄小道。

这所培黎工艺学校正在向前稳步发展,我们现在建造新的建筑,并且将有一个自己的真正宽敞的车间,使得我们的学生们去充分学习用车床和所有基础必需品加工。

在这儿会有很多无法想象的问题和困难,这些你们在英国是从来想象不到的;比如说,工具几乎是不存在的;每个男孩都应该自有一堆的木工器材或一些其他工具,但这样的想法又同样是不可思议的。

原材料的来源愈加匮乏、短缺。有个木匠师傅曾经教学生们去利用现有的一堆废木头和杂物设法制作一个算盘;学生们就用竹子和一些在小轮上的可以旋转滚动的泥块(做成算盘珠子),组合起来,在户外阳光下晾晒干而成。

在这里,牙膏是被禁止使用的,因此我们用盐来代替。我们自己衣服完全由我们自己制作缝制。外面黑色的帆布和里面的棉花絮垫衬。每个男孩一件配短腰带的外套上,再都配一条有衬垫的马裤。

当我们自己的毛纺织机械设备开始运转时(我们在小河的下游购买那块土地就是为了此目的),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编织羊毛织的毛衣。

我们已经从这些学生身上充分了解到,我们学校该收取什么样的学生,且如何培养以使得他们如何生活的更有成就以及有创造性。至少,大多数学生需来自劳动阶层的家庭、一些迟钝的本地农民和反映迅速的城市市民子女。不管这些战后的情况可能是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冒险招录超过10%的学生阶层的学生来入学,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一种恶习,他们对于用自己的双手来工作已经形成“长-邨”的态度,他们对于不愿意投入实际生产而善于指手画脚的资产阶级官僚们,及谁可以成为主席和官员的候选人一种由内而外的倾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有些人也是对于社会有社会意识,并且行为动作像极了优秀的领导者。我们也有一个学生在第一个月表现得极其傲慢而又不愿配合,但却在之后完全转变成成为学校中的骄傲。现在,我准备送他们去帮助修建我们兰州的新学校,我希望自

己也能够在那里呆几个周(或几个月)。我将告诉他们向东沿着路线走到洛阳,那是我们第三个学校开始的地方,也许下一年我们会再去中国西南部的成都市,在那儿不久我们希望开始第四所学校。在几年以内我们会有股新的潮流注入到各地的合作社中,同时从工人那儿给合作社带来新的生机。

我们最初也最原始的想法是,在学生完成学业毕业后,把他们直接送到合作社去参加工作。但是我的脑海里还有另一种计划,这些男孩可能还不够坚强,不能承受整个环境的大的变化,需要去适应,因为他们要一下子从学生突然成为担当起合作社的领导和顾问。他们可能会因为环境而改变,从而浪费他们在学校的所有非技术部分的培训。所以我们将设立一些一种缓冲状态或模拟实验性质的合作社和机器店实验纺织厂,运输路线等。这些都由学校经营,学生们在毕业后将被送到这些实验的合作社开始。他们将留在这个半保护合作社里实验性的工作一年左右,在出去进真正的社会,大的且已经变化的世界之前以期提升其技术和合作社知识。

我的特殊的家

在第一线从事培训工人,他们将必须明白和理解他们的工作目标和意义,且愿意因为他们对这样的工作感兴趣,有意愿去做并为此而努力。这样的培训目前开始需求增长。人们开始呼吁,希望在全国各地都建设其他的培黎学校,规范管理,争取都能使自身能够像陕西省双石铺的学校一样。

(你可能认为我们正在遗忘战争和其他世界大事件这样的事,但事实上,我们日复一日地用许多方式把它们带回家。)现代战争的取胜很少是完全依赖于武器,而是依赖于道德、组织和对于生活的总统态度。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的工作与我直接参战并取得胜利以及参与建设民主的常识一样的有价值,值得我为之奋斗的。

签名:乔治·艾温·何克

(原题:《THE BAILLI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SCHOOL》,译者秦泉安系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况 鹰



照片是1945年4月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照的。照片中后排左三是常书鸿(时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左四是唐森(时任工合西北办事处秘书,后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秘书)、前排左三是张官廉先生(时任工合兰州事务所主任)、前排左四是胡特议员(时任英国议会议员,英国消费合作社总社负责人)。1945年胡特议员千里迢迢来到刚刚搬迁就绪的中国工合山丹培黎学校考察,张官廉和唐森陪同。考察期间,他们驱车到敦煌参观莫高窟时的纪念留影。这张照片因

为是私人收藏,所以从未发表。胡特议员是中国工合培黎学校西迁山丹以后第一个前来参观考察的人。他的这次考察对山丹培黎学校支持鼓舞很大。不久,艾黎又陪同中国工合协会负责人徐维廉到山丹实地考察。这两次考察以后,中国工合协会就正式批准培黎学校西迁山丹,并改名“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山丹培黎工艺学校”。

(稿件来源自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网站2020.12.6,作者系路易·艾黎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宝鸡大新面粉厂厂徽背后的工合故事

王跟东

作为文物爱好者,我发现了一枚民国时期的厂徽,标识上注有“民国大新麦粉厂徽章”,并标注有徽章直径、重量及专用编码。经过我和同行辨识,确认是抗战时期内迁宝鸡的大新面粉厂厂徽。



早在1931年,民族企业家焦子斌从天津德商洋行购进了五部“米亚克”磨粉机,安装在石家庄新建的工厂里,成为我国较早拥有复式钢磨机器的厂家。这是大新面粉厂的前身。

1932年,焦子斌筹集资金五万元,将工厂迁至粮油集散地的河南漯河火车站,成立了大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大新面粉厂内迁宝鸡,在陇海铁路斗鸡台火车站附近建厂。

大新面粉厂不仅磨面粉供应着军需民用,还留下了热心参与社会办学的好名声。

“迁陕工厂联合会”集资要办惠工学校,急于解决子弟失学问题。这时正值各内迁厂建厂,资金紧缺无法调剂。大新面粉厂闻讯后愿意垫资支持建校。推动垫资的就是大新面粉厂的董事黄自芳,他曾担任过河南省教育厅长和郾城私立励行中学的校长,深知教育对民族的重要。



大新面粉厂的垫资启动了建校的行动。宝鸡县政府把太白庙拨给惠工学校作为校址。申新厂尚未恢复生产,只能供应砖瓦灰石等建材进行施工。随后,迁陕工厂联合会各成员厂筹足了惠工学校的后续资金,使得学校建成。

1939年9月,学校组织了校董会。申新纱厂经理李国伟任校董会董事长。董事会聘任黄自芳出任惠工学校第一任校长,他确定了“手脑并用,工学合一”的办学方针。先开设小学部,到1943年中学部开学。学校师资力量强,饱学之士黄自芳把惠工学校办成了远近闻名的学校。



1958年,按照政府指示,大新面粉厂与新秦面粉厂(前身即福新第五面粉厂)合并,更名为宝鸡市人民面粉厂。在大新面粉厂原址成立了宝鸡市机器厂,生产小型磨粉机。改革开放后,工厂改制为宝鸡自行车总厂。后来几经变更,现在名称为宝鸡杭叉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